



【编者的话】

又一个独裁者死了。

10月20日，利比亚过渡政府“全国过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贾布里勒宣布卡扎菲身亡。历经卡扎菲42年独裁统治和8个月的内战冲突之后，利比亚在10月23日正式宣布全国解放，成为今年以来继突尼斯和埃及之后的第三个推翻独裁政权的国家。

自 2010 年底开始，追求民主自由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阿拉伯世界，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相继倒台。本期周刊主题“大独裁者”，回顾 20 世纪以来几位知名独裁人物。

财新记者倪伟峰和章涛在《再见，卡扎菲！》一文中指出卡扎菲之死仅是个开始，尽管利比亚的未来长路漫漫，但独裁者的倒下鼓舞“阿拉伯之春”得以持续。东方早报记者张喆则对卡扎菲的一生作了详尽的介绍，读者可以看到这个“革命者”是怎样走上了“独裁之路”。

从萨达姆到卡扎菲，独裁者往往没有好的下场。在周刊第二部分，常青、陶东风、高放和王从圣等四位作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解读了萨达姆、穆巴拉克、斯大林以及苏哈托由掌权到政权覆灭的过程和启示。陶东风指出独裁政权易垮台的本质原因：“一个政权的长久稳定必须建立在民主自由、经济繁荣、社会公正的基础上，一个失去了民意的政权即使表面看来固若金汤，但一个非常偶然的事变就可以导致其下台。”

在独裁者掌权下的民众生活，正如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描述，往往必须承受信息封锁和政治高压。译言网的《平壤之春》观察了“阿拉伯之春”对朝鲜的影响，当权者的“第一条防线还是信息封锁”，然而逐渐扩大的朝鲜黑市使得“封阻跨越边境流入的信息也许在今后会越来越难”。阿拉伯公民伊扎特则由亲身经历向读者展示了在穆巴拉克统治时期，埃及民众如何通过政治笑话来发泄抗议的怒火。

放眼世界，现存的独裁政权已经越来越少，多数国家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然而人们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认为独裁已经远离了呢？熊培云通过对影片《浪潮》的解析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认为“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也都有灌溉独裁的潜力。只要条件成熟，这一切难免会与一种恶的集体主义里应外合，长出独裁的恶之花。”

最后，我们节选了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警示人们不要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走向独裁。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 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十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编者的话】	1
【覆】	4
10-1 财新网：再见，卡扎菲！	4
10-2 张喆：一个“革命者”的独裁之路	9
【传】	16
10-3 常青：萨达姆与他的独裁政权	16
10-4 陶东风：穆巴拉克下台的几点启示	29
10-5 高放：斯大林怎样破坏党内民主	33
10-6 王从圣：苏哈托 32 年的独裁统治为何三天之内倒台？	45
【政】	53
10-7 译言网：《外交政策》平壤之春	53
10-8 伊扎特：高压下的黑色幽默	56
【因】	62
10-9 熊培云：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评《浪潮》	62
10-10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节选：伟大的乌托邦	70
【FMN 一周新闻综述】	80



在 Google Buzz 分享本期周刊



【覆】

10-1 财新网：再见，卡扎菲！

“最终，中东—北非地区的独裁者们将各有不同的下场。这股注定横跨 2011 年和 2012 年的‘阿拉伯春风’，目前对整个地区而言仍然只是个开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阿拉伯人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不会小于其他地区。”



赶走一个独裁者需要多久？从来无人计算过。42 年前，卡扎菲通过政变登上权力舞台；42 年后，人们用了 240 天将他赶下了历史舞台。

被捕时，这位曾经受人顶礼膜拜的领袖，狼狈地隐匿在一个不起眼的排水管道里。利比亚人无情地将他揪了出来。讽刺的是，卡扎菲开口便诘问道：“我对你做了什么？”

很快，卡扎菲被捕的消息传到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人们对空鸣枪。电视画面显示，的黎波里的上空犹如礼花齐放，在炙热的周四晌午显得格外闪亮。

当天下午，在英国伦敦的利比亚大使馆所在地骑士桥（Knights Bridge），旅居英伦的利比亚人欢呼雀跃。“这是利比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在伦敦念书的 26 岁的利比亚小伙塔侯尼（Muhammad Tahouni）兴奋地对财新《新世纪》说：“我都不知该如何表达了！”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当时正准备接受电视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接过助理递过来的黑莓手机，仔细阅读了关于卡扎菲被捕的内容。“哇！”她诧异地说。她反复阅读手机上的内容，“哈！”希拉里接着感叹。



但当人们在猜想这位独裁者最终将如何受到国际法庭审判时，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NTC）确认，卡扎菲被捕后，其支持者和 NTC 有过一场交火，卡扎菲死于其中。同时，卡扎菲的儿子穆塔西姆（Mutassim Gaddafi）也被打死。

前路多艰

但在同样赶走过一名独裁者的埃及，开罗美国大学的政治系教授卡兹哈（Walid Kazziha）却审慎乐观，“这仅是一个开始。”他说，“赶走卡扎菲不易，但要处理利比亚内部诸如地区、部落甚至 NTC 间的矛盾更难。”

和卡兹哈教授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吉尔贝（Leslie Gelb）。在他看来，在人们的欢呼过后，在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的民主转型并不一定能一帆风顺。

“明天，下个星期人们或许都还会欢欣鼓舞，但我想下个月或者下一年情况将会不同。利比亚到底会成为反西方的恐怖主义势力温床还是逐渐走向民主的国家还很难说。”吉尔贝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

最为棘手的，便是如何处理鏖战多时的卡扎菲的拥趸们。

直到卡扎菲已死，其支持者还在为其誓死抗争。有评论认为，短期内利比亚街头或许仍会有零星对抗；不过也有观察家指出，伴随着卡扎菲的死，这些支持者的捍卫对象已不复存在，因此卡扎菲的支持者们很快就会放弃对抗。

“表面问题容易解决，但更深层次的矛盾则可能意想不到地出现。”卡兹哈教授评论道。

首先是地理因素。利比亚全国共有约 140 个部落，其中约 30 个部落具有实质影响力，而这些部落分别位于历史上彼此分离的三个区域：东部的 Cyrenaica，包括首都的黎波里在内的

西部 Tripolitania 和位于南部沙漠区域的 Fezzan，这些区域直到近代才合为统一的利比亚，但它们之间疏远关系历来有之。

NTC 发源自东部 Cyrenaica 省。该省的班加西（Benghazi）自今年利比亚革命以来，一直被称为革命的“摇篮”。由于在地理条件上沙漠和锡德拉湾（Gulf of Sidra）将此地与利比亚西部隔开，此区域历来是黎波里当权者难以控制之地，对卡扎菲来说亦是如此。

西部 Tripolitania 省则是利比亚的中心区域。这里曾是卡扎菲的大本营，也是众多部族的聚居地，其中包括利比亚第一大部族 Warfallah 和卡扎菲的部族。

卡兹哈认为，在利比亚正式交由 NTC 接管后，不同地区和部落间的冲突可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尽管内战不可能卷土重来，但接连不断的冲突定会使得这个新生国家的重建之路走得愈发艰难。

其次是利比亚反对派内部因素。尽管从外界来看，NTC 是单个实体；事实上，其内部构成相对松散，以在班加西的人为主，还有来自不同部落的人组成。

7 月 28 日，NTC 前军事将领尤尼斯（Abdul Fatah Younis）的被暗杀似乎将利比亚反对派间的矛盾瞬间释放了出来，甚至出乎英美等国的意料。

但彼时，由于各个派别都忙着对付同一目标，无暇调和深层矛盾。而当同仇敌忾的卡扎菲死后，更现实的问题是，谁说了算？在日常的国家管理中，NTC 需要不同派别的协作来达成目标。但从目前的状况看，这似乎只是一个理想的组织架构。

不过，一个更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卡扎菲统治的 42 年间，利比亚从未有过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制度建设。在西方语境里，利比亚正在“走入一个民主新时代”，但在过去几代利比亚人中，却丝毫没有民主政治的基础和教育。

卡兹哈认为，在后卡扎菲时代，这些问题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利比亚这个国家自身的矛盾。

春风吹又生

尽管前路多艰，但毕竟是走到了这一步，还得继续前行。这不仅是对利比亚而言，更是对该地区所有正在经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

在赶走中东-北非地区的三名独裁者后，叙利亚和也门自然落入了人们的视线。

“利比亚今天的消息，会进一步推动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进程，但也会更大地鼓励也门和叙利亚的抗议者。”卡兹哈教授表示。

就在卡扎菲死亡的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讲话中表示，卡扎菲的死是对中东等地区独裁者的严厉警告，这些地区的铁腕统治注定将走向尽头。

在演讲中，奥巴马还特别暗示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也门总统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奥巴马警告称，他们应吸取卡扎菲死亡的教训，立刻停止对国内抗议者的镇压并马上下台。

不过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分析员、前国务院情报分析部门副主任怀特（Wayne White）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由于 10 月 21 日礼拜五是穆斯林的祈祷日，叙利亚的反政府力量在受到利比亚形势的鼓舞下，有可能会在这一天做出更激烈的示威举动。”而这也可能引发执政当局更大规模的镇压，形成更恶性的循环。

也门方面，总统萨利赫 10 月 19 日对外界表示，如果美国、欧洲和海湾国家能够对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化解也门危机的调解协议实施提供保证，他将签署该协议。

也门于今年 1 月爆发反政府示威游行。随着国际社会和也门反对党压力的日益增强，萨利赫的权力也正处于崩溃边缘。

“而今卡扎菲的下场，定会加快萨利赫离位的进程。”一位也门派驻英国伦敦的外交人员在 10 月 20 日晚间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电话采访时这样表示。

但和利比亚不同的是，西方国家和北约目前没有对上述两国动武的打算。英国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在当天对财新《新世纪》记者明确表示，英国没有计划对上述国家采取类似利比亚的行动。

最终，中东—北非地区的独裁者们将各有不同的下场。这股注定横跨 2011 年和 2012 年的“阿拉伯春风”，目前对整个地区而言仍然只是个开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阿拉伯人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不会小于其他地区。

在的黎波里，坊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卡扎菲当年看到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在地道里被抓的画面，瞬时脸色煞白。据说这也促使他后来向英国交出了核武器的研究计划。而今天看到卡扎菲的下场后，不知对该地区的其他独裁者会带来何种震慑？

（发自财新网，原文链接：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0-21/100316503_all.html）

[【返回目录】](#)

10-2 张喆：一个“革命者”的独裁之路

“卡扎菲宣称要在利比亚实现最直接的民主，可他却将利比亚政治体系进一步集权化。”



“城市生活意味着你要追求某些欲望以及一些没有必要或有必要的奢侈享受。当目睹社会病态席卷整个城市，只有通过立法才能遏制这些行为时，我们一点都不吃惊。我们不相信病态会结束，也不相信我们会取得胜利，因为城市生活就是这样，这些病态是不可避免的。城市生活让人头晕眼花、作呕反胃、神经错乱、不知所措，我担心会神智迷乱，害怕面对城市生活以及城市问题。”

让这些见鬼去吧，赶快离开这里。要享受快乐，就要到乡下农村居住，这里的体力劳动意味着既能满足生活需要，又能强身健体，此外还是一种快乐。这里的生活是社会交际的舞台，充满了人情味。家族与部落之间联系密切。这里既有稳定的秩序，也有充实的信仰。”

——1988 年出版的一本卡扎菲小故事集《逃离地狱和别的故事》

生于沙漠，终于沙漠，穆阿迈尔·卡扎菲如同利比亚沙漠一样捉摸不定。

他醉心于文学，最在乎的头衔是利比亚作协名誉主席一职，这位贝都因牧民后代希望自己是一个忧伤的游吟诗人，独自一人跑到沙漠，在帐篷里沉思，聆听真主的声音。

他更醉心政治，崇拜埃及国父纳赛尔，痴迷于统一阿拉伯、构建非洲大联盟，他怒斥一些阿拉伯领导人是西方走狗，甚至要戴着白手套去阿盟开会，宣称这样才不会脏了自己的手。

他出生时，二战北非战场的战斗已近尾声，然而风云巨变时代的残酷体验，令这个部落男孩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对于利比亚的深深伤害，沙漠之子的童年经历影响了卡扎菲成年后的个性与个人生活，甚至包括他治理国家所执行的方针政策。



他被塑造成一位简朴的政治领袖，生活简单，爱住帐篷，爱骑骆驼，也爱喝骆驼奶。1969年9月1日“九月革命”推翻伊德里斯一世后，他的父亲仍在的黎波里的贫民窟里蜗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卡扎菲说，等所有的人都有了适当的住房，他父亲才有像样的住所。但随着统治时间日深，卡扎菲越来越深居简出，利比亚的老百姓甚至不清楚他到底住在哪里。如今，利比亚反对派取得胜利，利比亚人终于有机会一睹卡扎菲住所的“芳容”，并且无不为其奢华所震撼。

卡扎菲与利比亚人的蜜月期如此短暂，42年的统治，让其家族聚敛了惊人财富，却并未惠及普通民众，当利比亚人在体验到没有医生的免费医疗，奴化教育的免费教育，没有自由的“人民民主”之后，愤怒一次又一次积蓄，直到今年2月17日昔日的革命者成为“被革命者”，可他仍自负地对英国广播电台（BBC）说，“利比亚人爱戴着我。”

年轻的“革命者”

1970年1月10日，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名字才出现在利比亚的报纸上，当时距离“九月革命”已有4个月之久，利比亚人方才了解到那些自称自由军官组织的政变军人是何许人也。此时，已经从“上尉”自我提拔至“上校”的卡扎菲正忙于巩固革命成果，他的个人魅力与雄辩口才逐渐展现在国际社会面前。他禁止民众消费酒水，关闭教堂与夜总会，没收外资控制的银行，阿拉伯语成为国家唯一的法定语言，关闭了美英军事基地，驱逐意大利居民出境，限制国际石油公司的运营。

尽管卡扎菲被形容为一个无法预判的疯子，里根更是扬言要像对待贱民一样对待利比亚和卡扎菲，但一些分析家逐渐发现，卡扎菲的内心世界还是有迹可寻的。

卡扎菲生于利比亚沙漠中部，苏尔特以南50英里的小村阿布哈迪，出生时间可能是1943年春天，也有报道认为是1942年。卡扎菲父母都是不识字的贝都因人，没有对他童年的任何记录。卡扎菲于1988年发表的故事集被认为是研究卡扎菲的一个窗口，似乎这个来自传统部落家庭的独子，从始至终都未融入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



卡扎菲所在的卡扎法部落笃信伊斯兰教，他早期接受的教育主要是本地部落族长讲授的传统宗教课程，这也强烈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

后来，卡扎菲去了南部小镇塞卜哈接受中学教育，他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阿拉伯报纸和电台，他的老师、他的中学课本也都来自埃及，埃及发生的革命令他产生浓厚兴趣。部落来的乡下孩子成了政治少年，他不顾当局禁令发传单、搞游行，最终当局要求卡扎菲必须在高中前离开塞卜哈。后来卡扎菲回忆，正是这段政治实践让他明白，非暴力政治运动不可能改变“不民主”的政权。

随后，卡扎菲前往米苏拉塔完成中学学业，并且考入利比亚大学历史系当学生。他集中精力读书，从林肯的传记到孙中山的文集再到埃及革命、法国革命等相关书籍。卡扎菲还在米苏拉塔结识了一批学生，这些人大都热衷伊斯兰教原则、阿拉伯统一、自由和社会平等，他意识到军队是唯一能够推翻君主制政权的力量，于是在 1963 年报名加入班加西皇家军事学院，在入军校两年间，他成立了自由军官组织，并精选了 12 名干将，组成中央委员会。

1965 年 8 月，卡扎菲从皇家军事学院毕业，在陆军通信部队当一名通信员，次年他被派到英国接受军事培训。

卡扎菲成长过程中，中东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军事、政治事件：1948 年以色列建国并击败阿拉伯联军；1952 年埃及革命；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1958 年埃及与叙利亚商议联合。这些事件令卡扎菲的世界观产生强烈影响，他成了纳赛尔革命政策的狂热崇拜者，卡扎菲与同时代人不同做法是，他决定将埃及革命带到利比亚。

因此，这个 30 岁还不到的年轻革命者，照搬埃及革命模式，“九月革命”目标——自由、社会主义与统一，与 1952 年纳赛尔革命提出的口号如出一辙，自由军官运动颁布的一系列利比亚国内外政策也与纳赛尔上台时出台的政策完全一样，甚至于 1969 年卡扎菲的演讲，也模仿了 17 年前纳赛尔发动革命时的讲话。

卡扎菲视自己为纳赛尔的接班人，然而讽刺的是，1970 年 9 月 28 日郁郁寡欢中去世的纳赛尔却从未认可这位自作主张的政治继承人。



自相矛盾的“统治者”

卡扎菲一直宣称自己的终极目标是要在利比亚构建一个不需要政府的社会主义国家，1975年当他的《绿皮书》第一部分正式出版之后，卡扎菲的革命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在绿皮书里，他的结论总让人感到自相矛盾，卡扎菲宣称要在利比亚实现最直接的民主，可他却将利比亚政治体系进一步集权化，政治与经济发展等重大决策均掌握在卡扎菲家族及少数亲信手中，经济方面虽力求平等公平，却不免令人联想到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实验，而在社会改革层面，他一方面强调要男女平等，但又说男女生物意义上本就有所不同。

卡扎菲发誓要消除利比亚的部落，担心它们过于强大，影响他的统治，他要求与控制利比亚石油定价权的西方石油巨头重新谈判合同，威胁否则将关闭油井。他警告跨国企业人员：“利比亚人在没有石油的情况下生活了 5000 多年；为自身合法权益，不在乎再过几年没有石油的日子。”这一“赌博”之举成功，利比亚开始掌握自己的石油资源，财政收入剧增。

1959 年利比亚才发现石油，可到了卡扎菲执政后，利比亚国民人均收入才超过 1.2 万美元，卡扎菲在“脱贫”政绩上成绩斐然，然而问题在于，财富并未被普通民众感受到，当卡扎菲在整个 70 年代兴建道路、医院、学校和住房之后，利比亚更希望自己的口袋里能有更多的真金白银，卡扎菲却说，“石油让利比亚社会变得懒惰，希望拥有一切，必须改变这样的生活方式，要把钱用在生产上，而不是消费上。”

上校在努力实践着自己的朴素生活，可关于卡扎菲家族生活糜烂的传闻却不断在利比亚传开。

今年当反卡扎菲的军队占据卡扎菲的家族别墅之后，卡扎菲喜欢住帐篷的说法却显得有点不那么真实——卡扎菲一家人都喜欢意大利名贵家具和高级羊毛地毯。这些东西在每座别墅里是“必备的”。度假城内设潜水中心、网球场、游泳池、足球场、餐厅和医院。

2010年该国石油收入为 320 亿美元，然而利比亚的薪资水平却只有 300 至 400 美元左右，此外该国 40%左右的年轻人处在失业状态，国富民穷的状况如同一颗随时引爆的炸弹，但根据维基揭秘的说法，利比亚领导层在邻国突尼斯发生革命后，仍然认为本国安枕无忧。

卡扎菲的子女们更是非富即贵，长子穆罕默德·卡扎菲任职利比亚邮电总公司主席及利比亚奥林匹克委员会，还在利比亚的一家饮料公司中拥有 40%的股份。次子赛义夫·卡扎菲推动了利比亚经济改革，并在利比亚弃核进程与洛克比空难赔偿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是利比亚仅次于其父的第二号人物，并被视为下任接班人。他通过自己“**One-Nine Group**”的一家附属公司涉及利比亚的石油业。女儿艾莎·卡扎菲在利比亚的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当过法学教授和律师，主要帮其父管理酒店业，也与能源及建设领域较密切。性格与卡扎菲相似，因长相俊俏和身材惹火，被称为“利比亚第一公主”。

决不投降的“刺头”

在西方国家领导人眼中，卡扎菲行为怪异，难以琢磨，不愿接受任何“约束”。虽然大权在握，卡扎菲没有官方头衔，因而避开了国外诸多限制。不管在国内还是出访外国，卡扎菲经常身穿部族传统服装，住在一顶巨大的帐篷内，身边有十几名女性保镖护卫。他在帐篷内会见过多名西方领导人，包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2009年联合国大会期间，卡扎菲首次现身联大，他在演讲中表示，安全理事会应该改名为恐怖理事会。他要求安理会进行全面改革，取消 5 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增加常任理事国数量，尤其是增补非洲国家代表。卡扎菲还说自从联合国 1945 年成立以来，世界上发生了 65 次战争，联合国根本没能力阻止这些战争爆发。

卡扎菲当天的发言排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后，但奥巴马和希拉里等高级政府官员在演讲之后立刻离开会议大厅，避免听到卡扎菲的演讲。虽然联大给每个国家领导人的时间是 15 分

钟，但卡扎菲的演讲时长 1 小时 36 分钟，由于接近午餐时间，大会堂中有将近一半的代表都中途离场。

非洲联盟会议期间，他屡屡发表争议性讲话，不时当面抨击一些非盟成员，宣称自己是“非洲国王中的国王”。一些会议场合，他会点一支烟，毫无顾忌地吞云吐雾。

西方国家一度指认卡扎菲支持恐怖组织，双方关系长期冷淡。1986 年，德国首都柏林一家夜总会爆炸，两名美军士兵和一名平民死亡。美国认定利比亚特工制造这起袭击，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下令空袭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和东部城市班加西。卡扎菲本人安然无恙，而空袭严重损毁两座城市，多人死亡，包括卡扎菲的一个养女。卡扎菲下令保留的黎波里一处遭损毁建筑，在一侧修建纪念雕像，显示击毁美军战机的一个巨大铁拳。

1988 年 12 月，美国泛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苏格兰洛克比镇上空爆炸，乘客、机组人员和地面合计 270 人丧生，包括 189 名美国人。利比亚特工涉嫌这一事件。

美国等国家对利比亚实施经济制裁，孤立卡扎菲。近年来，卡扎菲调整对外政策。2003 年，卡扎菲宣布放弃秘密研制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项目。利比亚同时愿意为洛克比空难承担责任，向遇难者家属赔偿。

美国投桃报李。2004 年 9 月，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宣布结束对利比亚的制裁。利比亚与西方关系随之升温。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等西方国家高官到访的黎波里，卡扎菲得以访问欧洲，造访欧洲联盟总部。

2011 年，利比亚国内局势动荡，西方国家指认卡扎菲镇压反对派，双方再次“翻脸”。

几乎直到最后关头，卡扎菲都试图显示自己是其人民中的一员。当今年抗议者初次涌上的黎波里街头时，他提出与他们一道抗议：想必多年阅读《绿皮书》的教诲之后，这些人也应该学会了像他一样思考。不过，抗议者却开始敢于对利比亚以及对卡扎菲本人，产生不同的想法。

中国、俄罗斯等国，非盟、东盟等国际组织曾一度力促利比亚双方和解，给予卡扎菲多次体面下台的机会，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还曾公开表示欢迎卡扎菲前往该国居住，然而都被卡扎菲拒绝了，他强硬表示自己是利比亚唯一合法的统治者，他不能被“流窜的老鼠打败”，甚至当反卡扎菲武装在北约的帮助下在今年 8 月攻入首都的黎波里，卡扎菲再次表示自己决不投降要血战到底的决心。

今年 10 月 6 日，逃亡中的卡扎菲发表最后一次录音讲话，呼吁利比亚国民以和平手段推翻新政府。卡扎菲又在录音中，质疑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合法性，批评这个组织并未得到利比亚国民以投票或委任方式授权。卡扎菲更警告，所有支持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国家领袖，最终都要承受被北约等外国势力所控制的傀儡夺权之恶果。

随后，他失踪了。

等他再次出现时，2011 年 10 月 20 日，卡扎菲迎来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张喆：《东方早报》国际部记者。原文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21/2011/10/21/682927.shtml>）

[【返回目录】](#)

【传】

10-3 常青：萨达姆与他的独裁政权

“世人都知道萨达姆永不满足于目前所得，他是一个只相信武力并用它来扩展威权的人。”

萨达姆的生平简介



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 1937年4月28日出生于伊拉克萨拉赫丁省提克里特的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丧父，靠叔父抚养成人。1960年，他前往埃及开罗大学攻读法律。

萨达姆20岁加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很快成为该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曾长期担任党的地区领导机构副书记职务。

1969年，萨达姆当选为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1979年，他出任伊拉克总统，并兼任伊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总书记。

1980年，萨达姆领导伊拉克同邻国伊朗进行了历时8年的两伊战争。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引发海湾战争。

2003年3月20日，美英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对伊发动战争。4月9日，美军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萨达姆政权垮台。同年7月22日，萨达姆的两个儿子乌代和库赛被美军打死。

2003年12月13日，萨达姆在其家乡提克里特被美军抓获。2004年1月，美国宣布萨达姆为战俘。同年6月30日，萨达姆被美英联军“正式移交”给伊拉克临时政府。7月1日，伊拉克特别法庭开始对萨达姆进行审判。2006年11月5日，伊拉克高等法庭宣布，萨达姆因在1982年躲过杜贾尔村暗杀后对当地村民采取报复行动，杀害了143人，犯有反人类罪被判处绞刑。同年12月30日，萨达姆被处死。

不招人喜欢的遗腹子

萨达姆贫寒的家世对其性格的养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萨达姆还在娘胎里时，他的父亲和哥哥就意外去世。据一位邻居称，萨达姆的母亲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打击，她一夜间苍老了许多，甚至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整日寻死觅活，还声称要堕胎。幸运的是，萨达姆终究还是平安来到人世，只是可怜的他特别不招人喜欢，就连妈妈都不想见到他。

萨达姆人生的前3年是在图尔法赫叔叔家度过的。叔叔很疼他，把他当做亲生儿子一样对待。萨达姆3岁那年，母亲改嫁，新丈夫是萨达姆家的一个远亲。叔叔把他送回新家。萨达姆的继父待他很不好，经常虐待他，也很少和他讲话。由于缺少同龄孩子的家庭温暖，小萨达姆过早地看透了世态炎凉，他性格孤僻、脆弱且敏感，无法接受任何批评。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家庭氛围，萨达姆自幼就只相信自己，心里根本没有别人的容身之地。这也使得他在以后执政的岁月里，从来不会顾及伊拉克普通百姓的痛苦，只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继父强权一般地教育使得倔强的萨达姆从小就形成了一个习惯：从不向强权屈服。更重要的是，小萨达姆意识到，如果不想被欺压，最好的办法就是控制所在的环境，利用有利条件欺压别人。

8岁那年，萨达姆从继父家里悄悄逃回蒂克里特镇的叔叔家。图尔法赫叔叔很有才华，后曾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做官。正是他为萨达姆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使他最终能跨入政坛。图尔法赫性格倔强，一辈子痛恨英国人。他曾告诉过小萨达姆：波斯人、犹太人和苍蝇是上帝的



错误创造出来的。他还一直激励萨达姆说：你一定要成为阿拉伯世界伟大的领导人。年幼的萨达姆永远记住了这句话，而且毕生都在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可以这么说，图尔法赫对萨达姆的一生产生了相当关键的影响。

造反与夺权

1955年，18岁的萨达姆来到首都巴格达。一年后，不足20岁的他申请加入左倾的社会复兴党。据悉，当时的社会复兴党只是一个在伊政界无足轻重的小党。该党将建立单一的阿拉伯国家、重振阿拉伯国家雄风当做头号目标，这一点深深吸引了年轻气盛的萨达姆。1959年，年轻的萨达姆在复兴党内崭露头角。

1958年，他参加了反对原伊拉克国王的政变（失败）。1959年10月参加刺杀总理卡桑行动，被伊拉克政府判处死刑，而他本人则经叙利亚逃到埃及开罗。

1960年在埃及开罗大学修读法学时，他开始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接触。当时美国担心伊拉克政府与共产党关系日益密切，于是向复兴党及其他反政府势力提供援助。1963年2月8日，在复兴党发动军事政变夺权后回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萨达姆开始掌管党内势力。但同年11月，当时总统阿里夫大举缉捕复兴党人，他在1964年被捕。但在狱中他被选为复兴党副书记，并在1967年越狱。

1968年7月，萨达姆回到伊拉克协助发动政变，推翻阿里夫总统，使复兴党再次掌权。翌年，他成为革命指挥部的副书记以及宣传部长和安全部长。1972年6月1日起，他开始将外国的石油公司国家化，并将石油收入用来建造军队。虽然他没有军事经验，但他要求晋升为军队将军。1975年3月，与伊朗国王签订协议，伊朗停止支持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叛乱。

从1968年7月起，萨达姆成为伊拉克实际上的首脑和名义上的第二把手，当时名义上的第一把手是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贝克尔。正如当时数位同事所言，萨达姆平日沉默寡



言，甘于多年位居第二，深得韬光养晦之道，举止行动看上去只是党内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贝克尔担任主席的 10 多年中，萨达姆有功上缴，有错自揽，赢得了贝克尔的信任。1979 年 7 月，贝克尔以健康为由主动辞职，萨达姆终于登上总统宝座，并集最高军事统帅、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及复兴党党魁于一身。

上任头一天，萨达姆以“开会”为名，在巴格达召集了数百名伊政府官员。会上，萨达姆以叛国罪处死了 60 名异己。遵照萨达姆的旨意，被处死的“叛徒”死前都经受了酷刑的折磨。有人注意到，当一个个“叛徒”被拉出去时，萨达姆竟然哭了。此后，这场清洗运动的录像带在全国热卖，伊拉克民众惊呆了！从那时候起，伊拉克政界无人胆敢挑战萨达姆的权威。

更令众人不能理解的是，对萨达姆有养育之恩的叔叔图尔法赫不仅没有沾上侄子一点光，反而被萨达姆毫不留情地撵下了台，永远退出了政界。

权力至上的自恋狂

萨达姆登上总统宝座后，有关他暴虐残忍的报道屡见不鲜。据称，萨达姆偏执且敏感，想获取他的信任极其困难。通常情况下，他喜欢注视别人的眼睛，因为他相信眼睛会透露人内心的秘密。萨达姆就以这种方式判断一个人终究会成为他的叛敌还是至友。

据萨达姆上世纪 70 年代的一位顾问称，如果萨达姆第一眼见你，就觉得你是叛徒，那你一定在劫难逃，只等着被判卖国罪受死。据会见过萨达姆的英国驻伊前大使埃杰顿称，在一个冷气开得极足的房间里，他亲眼看到站在萨达姆身旁的官员们全身是汗。1991 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萨达姆召集伊国内一些著名的宗教领袖开会，强迫他们对外宣称所进行的战争是“圣战”，并声称“如果你们想看到明天的太阳，就按我说的做”。

尽管如此，萨达姆特别注重自己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因此与客人第一次见面时，萨达姆总是温文尔雅，看起来像个绅士。据一位曾见过萨达姆的库尔德人称，萨达姆讲话节奏很慢，他

总是表现出对你的话题很感兴趣的样子，认真倾听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一位英政府官员会见萨达姆后也表示，萨达姆与人握手时很“温柔”，谈话时总喜欢眼睛看着地下，似乎很害羞。

据称，会见萨达姆前的“手续”极为繁琐。除搜身外，一些来访者还被要求洗净双手，甚至张开嘴让医生检查一下有没有感染疾病。卫兵对此解释为：“如果你咳嗽，那你会传染给我们的总统的。”

萨达姆一生经历过数场战争，磨炼了他坚强的性格。对萨达姆来说，权力是人生中最重要东西。只有拥有权力，他才能不再受人欺辱，才有希望实现自己重振阿拉伯国家雄威的远大理想。因此，萨达姆宁可战死，也不会选择流亡。

由于对人不信任，萨达姆必须偷着睡觉，必须不停变换睡觉的时间与地点，不断地从一张床转到另一张床，他几乎不在他的王宫中过夜。睡觉和固定的例行公事成为他难得的享受，每当萨达姆合眼睡觉时，仿佛他领导下的整个国家都会四处漂移。那时候，萨达姆就必须信任别人，而对他来说，世上的事情再没有比信任这两个字更危险的了。

杀人记录

在他的独裁统治下，萨达姆下令暗杀所有反政府政治活动人士，并迫害反对他的宗教团体与非宗教团体。

萨达姆生前曾面临 5 0 0 多项指控，但萨达姆最终“栽”在杜贾尔村案上。伊拉克法庭从杜贾尔村案入手，对其进行了起诉，原因是这宗案件的证据充足、脉络清晰，定罪相对容易。检察人员指控萨达姆在 1 9 8 2 年躲过杜贾尔村暗杀图谋后，对当地村民采取报复行动，并一举杀害了 1 4 3 人，拷打并监禁一千多人，报复其对自己刺杀未遂的行动。虽然证人无法证实萨达姆直接“虐待”人民，但仍被追究“领导责任”。

1983年，他下令杀害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巴尔扎尼所在部族 8000 人。1980 年代末，萨达姆政府指责库尔德武装勾结外部势力袭击伊拉克安全部队，于是展开了对库尔德人的大规模报复行动，进行种族灭绝计划。据有关机构估计，报复行动造成约 10 万名库尔德人死亡，2000 多个村庄被毁。在系列行动中，影响最大的是伊拉克军队 1988 年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哈拉布贾村，一天之内造成 5000 人死亡，10000 多人受伤。此后，从 1991 年起，他推行所谓“阿拉伯化计划”，没收库尔德人之土地，并剥夺其粮食，将数千名库尔德人从伊拉克北部驱逐到伊朗。

在 1974 年，他处决 5 名什叶派宗教人物。1991 年，萨达姆在伊拉克南部镇压什叶派穆斯林起义。之后，他下令在伊南部湿地修堤筑坝，破坏伊拉克南部湿地。

父子家天下

乌代和库赛是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长子和次子。由于身份特殊，他们在伊拉克的政坛上炙手可热。

乌代是萨达姆的长子。他 1964 年出生于巴格达。曾就读于巴格达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工程学位。毕业后改读军事科学，并获博士学位。乌代因深受其父宠爱而先后主管过内外贸易、新闻、体育、青年学生组织等各项工作，也一度掌管过伊装备精良的准军事组织“萨达姆敢死队”。随着羽翼渐丰，乌代被其父授予中将军衔，享有与父亲同样的生杀大权，并一度被内定为萨达姆的接班人。

1996 年 2 月，乌代曾直接参与暗杀背叛萨达姆家族的两个亲妹夫卡迈勒兄弟。因在党、政、军各界树敌颇多，乌代 1996 年 12 月 18 日在一次未遂暗杀事件中身受重伤，性命虽保，却落下终生残疾。之后，他被父亲排斥到权力核心之外。

库赛是萨达姆的次子，1966 年出生于巴格达，曾就读于巴格达大学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库赛性格内向，沉稳老练，不事张扬，深得其父赏识。在其兄遭枪击致残后的数年



内，他逐渐接替了乌代的权力。库赛原来只负责伊拉克情报部门和共和国卫队。乌代失宠后，他逐渐被委以重任，成为伊国家安全机构的负责人，除主管保障萨达姆及其家族、政治高级官员安全的特别安全组织，还掌管着伊最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和负责镇压国内叛变行为的“萨达姆敢死队”。此外他还受命掌管政府经济委员会工作，负责监督所有石油、贸易、和金融交易。

1999年8月，萨达姆发布总统令，授权库赛在“紧急情况下”代替他行使总统权力。2000年4月，萨达姆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宣布库赛为其接班人。2001年5月，库赛首次入选伊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并出任该机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年，库赛还被任命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军队司令部的副司令，实际上也就是伊拉克武装部队的副总司令。

奢侈的生活

萨达姆能常在凌晨3点就起床，他每晚只睡4~5个小时，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泳池游泳，萨达姆众多的王宫和住处都备有游泳池。在伊拉克这样一个沙漠国家，水成了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喷泉、泳池、室内溪流与瀑布成为萨达姆居住的所有建筑物的一个主题。萨达姆想要什么呢？种种情况显示他对金钱并没多大兴趣，这一点与其家庭其他成员不同。萨达姆的妻子萨吉达在伊拉克与西方关系良好时经常光顾纽约和伦敦的富人购物中心，他的长子乌代经常驾驶着昂贵轿车和身着自己设计的耀眼服饰招摇过市。萨达姆本人虽然是个享乐主义者，但他生活颇为节俭，他对名望的兴趣似乎远远超过了金钱的兴趣。象中国的皇帝一样，手不碰钱，看似生活简单，但却与皇帝无二。

伊拉克政府有关部门每周都要为萨达姆空运新鲜食品——虾、鱼、大量的瘦肉和日常食品。这些空运食品首先要交到核科学家手中，他们先用X光对食品进行检查，然后进行辐射和毒物测试。在欧洲经过专门培训的厨师在萨达姆私人保镖的监督下开始为其准备食物，萨达姆居住的20多个行宫都配备了厨师和食品，每个地方都要为萨达姆准备一日三餐。伊拉克总统

的安全制度要求，即使萨达姆不在，各行宫每天也要表演哑剧节目，像萨达姆就住在宫中一样。

个人崇拜

萨达姆希望被人崇拜和尊敬，有关萨达姆的官方传记成为伊拉克政府官员的必读书籍。萨达姆授意手下拍摄放映时间长达六小时的有关他生活的影片《漫长岁月》。萨达姆的这种自我崇拜不仅仅是政治策略。他的名字、他的口号和他自己标榜的美德以及他的成就在伊拉克不断重复，其目的在于使得国人相信他的权力似乎是必然的和无法挑战的。这样，萨达姆最终受到国人的赞扬已不是出于爱和尊敬，而是出于责任义务——人们必须赞扬他。

伊拉克是块古老的土地，被称为“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地”，它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漫步在巴格达街头，有种历史的凝重感，在该市，翻新和保持文化古迹已成为一大市政项目。根据伊拉克的法律，在翻新古迹所用的砖头中，十分之一都必须贴上萨达姆的名字或者标上八颗星(每颗星代表着萨达姆阿拉伯姓名字母)。

由于萨达姆的世界观本质上是属于部落和家长制的，所以命运就意味着流血。萨达姆下令家族学者构画了一棵看似合理的家族树，把他自己与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提玛联系在一起。

萨达姆多年来一直热衷于大兴土木，那些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建筑物反映出他视自己为留名青史的英雄的心理。萨达姆的故乡提克里特在 900 年前诞生了一位抗击十字军东征的民族英雄萨拉丁，萨达姆对此从未忘怀。他在巴格达修建了一座总统行宫，行宫内外云柱顶端都雕刻着他巨大的头像，戴着萨拉丁的头盔。他又将新落成的战争之母大清真寺的顶端做成尖塔状，以象征在海湾战争时向以色列发射的飞毛腿导弹。所有这一切都让外人清楚地看到他的勃勃野心：萨达姆企图让世人将他当作恢复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往日辉煌的领袖人物来鼎礼膜拜。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前执行副主席查尔斯·杜尔弗一针见血地指出：“萨达姆将自己视为阿拉伯人命运之神的化身。”

萨达姆还花了大把的钱修建了许多庞大无比的清真寺、一座又一座富丽堂皇的总统行宫和数不清的他个人的塑像。那种高高地站立着以一手向前伸出的巨大雕塑像，使我们联想到苏联的列宁巨像与文革时期遍布全中国的毛主席巨像，而且这三者在姿态上又是何其相似。有人开玩笑说，伊拉克的 2400 万人口人均可以得到一尊萨达姆的塑像。伊拉克国内和国外许多人都对花钱修这些大而无当的东西表示愤慨，他们认为这根本就是浪费钱财，政府应该为老百姓多盖一些急需的住房。

恐怖与犒赏

一位流亡的伊拉克作家卡南·马基亚在他 1989 年出版的著作《萨达姆的恐怖共和国》中将伊拉克描绘成一个实行高压统治的恐怖王朝。萨达姆一直残酷压榨苦难深重的伊拉克人民，以此动摇国际社会支持联合国对其政权实施经济制裁的决心。接着，萨达姆又变换了手段，企图达到另一个目的，即防止饱受蹂躏的伊拉克人民起来反抗他的统治。萨达姆通过合法的石油出售和非法的石油走私聚敛了大量钱财，他曾用一些钱来收买一小撮人为其效命，如今他试图用钱来赢得民众的支持。

萨达姆对西方社会所知不多，围绕在他身边的都是一些唯唯诺诺的小人，专拣他喜欢听的话来说。萨达姆身边的所谓“朋友”都是用钱买来的，他的小圈子控制了伊拉克 7% 的商业活动。一位 32 岁的伊拉克商人说：“爱戴萨达姆的人都是他的亲属，其他的人，甚至最接近他的那一圈人都是拿了好处才为他效力的。”萨达姆的统治手腕体现了恐怖和犒赏的精密结合。伊拉克国民大会的美国顾问弗兰西斯·布鲁克说：“萨达姆可以让你瞬间变成百万富翁，也可以转眼就杀掉你，这两种手段都非常有效。”有时，恐怖和犒赏这两种手段是同时使用的，比如，当一个在监狱里遭受酷刑折磨的伊拉克人被释放回家后，竟然发现自己被奖励了一辆崭新的奔驰轿车。

哈马扎是一位叛逃的伊拉克科学家，曾经主持萨达姆的原子弹计划，于 1994 年逃离了伊拉克。在他的著作《萨达姆的原子弹制造者》中，哈马扎描述了萨达姆如何慷慨地赐予属下诱人的权势。哈马扎写到，萨达姆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俱乐部会员证、配备私人司机的高级轿车、豪华的住宅和出国旅游等都是萨达姆常用的笼络人心的手段，他以此收买一部分人来保护其人身安全和扩张他的利益，酷刑折磨、坐牢和处决则用来对付那些失职或冒犯他的人。

萨达姆及其政权的野蛮暴行可谓罄竹难书。阿布·哈里斯（化名）早年在接近萨达姆的小圈子里供职，人们至今仍能看出他当年的气派：哈里斯留着萨达姆式的小胡子，大腹便便，走路来就像一名高级官员那样威风八面。他曾在伊拉克国防部的外事委员会工作了 1 年，然后被调往特别安全组织（SSO），这是一个负责保卫萨达姆个人安全的精锐情报机关，同时负责制造和隐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执行其他敏感任务。20 世纪 90 年代，哈里斯被调往约旦经营一家公司，负责向伊拉克进口电脑、化学分析仪器和用于伪造护照的特别纸张。此后，他又被派到阿联酋的迪拜监管伊拉克的一个专门从事石油走私的大公司。

如今，哈里斯的指端和右腿已经没有知觉了，全身关节疼痛，手指肿胀。据他说，这些症状都是被萨达姆儿子乌代的保镖们用毒药害的。1998 年 10 月的一天，哈里斯带着他年轻漂亮的侄女外出散步，不料遭遇了驾车四处兜风的乌代。乌代以玩弄女性而声名狼藉，他对哈里斯侄女的美貌垂涎欲滴，命令手下将她强行带走，以供其一夜淫乐。哈里斯怒斥这些爪牙，令他们悻悻而归。当天晚上，乌代指使暴徒将哈里斯从家中抓走，把他关押在乌代的农庄里。据哈里斯说，他被绑在一棵棕榈树上长达两天两夜，并不断遭受毒打。乌代用烧红的烙铁烫哈里斯的背部和肩膀，一个爪牙则在哈里斯的手臂上注射某种药物。哈里斯说，注射时很疼，皮下至今仍有肿块。后来，暴徒们用车将哈里斯送回巴格达，将他扔在了家门口。当哈里斯逃到库尔德人控制的伊拉克北部，他的怀疑被证实了：乌代的爪牙们给他注射了铊。这是一种用在毒鼠药里的重金属，可以造成人和动物的内出血及慢性死亡。库尔德官员将哈里斯送往土耳其接受治疗，救了他一命。

哈马迪上校（化名）曾是伊拉克第三军团坦克部队的指挥官，他被诬陷与反对派组织有联系而遭到逮捕，被关进大牢 10 个月。据哈马迪上校说，萨达姆的军事情报机关每周都要对他

进行好几次酷刑折磨。他说：“有时他们将我吊在天花板的风扇上面，强迫我承认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去年春天，哈马迪上校被释放，于是他逃亡到了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自治区。然而哈马迪的家人还在萨达姆控制的范围内，他的父亲最近遭到了逮捕。哈马迪上校说：“如果有人胆敢反对萨达姆，他的每一位亲人都会遭殃。”

草木皆兵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由于害怕美国会立即对伊拉克发动报复，萨达姆特别加强了个人人身安全的保护措施，他的贴身保镖都换成了自己的亲属。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这些保镖就是照片上出现在萨达姆身边的那些拿枪的人。”萨达姆的第二层保镖也是他的亲信，他们来自萨达姆家族或是别的令他放心的家族。这些人担任伊拉克高级官员及其家族成员的安全保卫工作，同时监控伊拉克人民。萨达姆最外围的保镖就是 SSO，由他的儿子库赛掌管。

库赛及其控制的 SSO 的权势日益突出，以至于伊拉克军方都将 SSO 的成员视为掌握着绝对权威的人物，士兵们将这些狗腿子称为“少爷”（theMasters）。反对派伊拉克全国运动（the Iraqi NationalMovement）的一名高级官员说：“伊拉克军团的每位司令官身边都被安插了一名‘少爷’，时刻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在萨达姆的严密控制下，老百姓对所遭受的压迫敢怒不敢言，他们近乎本能地深深隐藏自己真实的情感。现年 38 岁的蕾拉曾在政府部门的办公室工作，她说：“我从来就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过在自己信任的亲朋好友面前，伊拉克人还是会抱怨萨达姆的种种恶行。萨达姆对伊拉克的高压统治形成了伊拉克老百姓扭曲的求生本能，他们感到厌倦和幻灭，害怕参与推翻萨达姆统治的阴谋，他们对流亡在外的反对派抱着轻蔑的态度。

萨达姆牢牢地控制着伊拉克的情报机关和安全部门，伊拉克政府官员的家人都是他手中的人质。萨达姆政权还颇善于营造一个全体伊拉克人都怀有犯罪感的环境，也就是说，这个政权让每个人都去行贿受贿，草菅人命，让他们每个人都害怕受到未来的民主政府的审判。



当美军进攻伊拉克时，各国随军记者有 200 多家，包括中国的凤凰卫视。我在电视上看到，当记者问站在路边观看美军进兵的伊拉克人民“是否喜欢萨达姆”时，他们都答“不喜欢”。记者再问他们是否喜欢布什时，他们多数答“maybe”（也许喜欢，也许不喜欢）。

独裁者的末日

但是世人人都知道萨达姆永不满足于目前所得，他是一个只相信武力并用它来扩展威权的人。当他认为伊朗正处于劣势，他就发动进攻。当他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科威特时，他就悍然出兵。显然，萨达姆掌握这些武器主要是为了对付美国和以色列。如果他能够打击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并能侥幸继续生存，萨达姆会铤而走险的。

海湾战争爆发前几个星期，CIA 向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提交了一份萨达姆的心理分析报告，这份报告的基本内容至今没有做大的变动。心理分析专家们认为，萨达姆人格稳定，行为理智，计划周详，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他有精神疾病。报告指出，萨达姆善于玩弄权术，享有绝对的威权，独断专行，喜欢炫耀武力，冒险出击。但他并不是一个凡事不计后果的人，他非常机警，善于投机。不过报告认为，萨达姆自以为是的神圣使命感会影响他的判断力。

萨达姆上台执政一年后，伊拉克和伊朗爆发历时 8 年的战争，两伊战争共造成 1 0 0 多万人死亡，给两国人民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伊拉克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国家元气大伤。1 9 9 0 年，萨达姆派军队入侵科威特，又引发海湾战争。战争爆发后，联合国随即对伊拉克采取全面制裁。

2 0 多年来，萨达姆一直对伊拉克实行铁腕统治，并在世界上以敢于与美国叫板著称。不过，据流亡的哈马迪上校说，（在美军第二次出兵之前）伊拉克的军队装备很差，士气低落，粮饷不足。他说，在他原来指挥的 33 辆坦克中，有 15 辆无法执行军事任务。在伊拉克这个盛产石油的国度，坦克竟然会缺少润滑油。据华盛顿的官员说，经济制裁行之有效，萨达姆的 42.4 万大军已经被严重削弱了，只有大约 10 万名共和国卫队士兵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因此在

美军的打击下，伊拉克军队很可能迅速瓦解崩溃。不过伊拉克内外的军事专家都指出，大约 1.5 万到 2.5 万名誓死效忠萨达姆的精锐部队（库赛手下的 SSO 及共和国特别卫队）将会与美军展开殊死较量。

2003 年 3 月 20 日，美英借口伊拉克仍在研制或已经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伊实施军事打击，伊拉克战争爆发。此前的 2 月 2 日，萨达姆否认伊拉克有违禁武器，否认与基地组织有任何关系。3 月 15 日，伊拉克开始备战，全国被分为四个军区。3 月 20 日，美军发动对伊拉克的攻击，开始实施“斩首行动”。4 月 9 日，萨达姆在巴格达的雕像被推倒，标志着美军占领了巴格达，萨达姆的政权被摧毁，结束了其 24 年的统治生涯。

2003 年 7 月 22 日，驻伊拉克美军司令官桑切斯中将在巴格达确认，萨达姆的两个儿子乌代和库赛被美军击毙。12 月 13 日伊拉克时间晚上八时，萨达姆在他的家乡提克里特被捕。经过一次迅速的 DNA 测试，确定是萨达姆本人。2004 年 1 月 10 日，美国正式宣布：根据日内瓦公约确定萨达姆为战俘，并获得战俘待遇和权利。

2006 年 12 月 30 日，萨达姆被伊拉克民主政府的特别法庭处死。那一天，是全世界穆斯林即将迎来最盛大节日之一的牺牲节之际，萨达姆被推上了绞刑架。在得知萨达姆被处死的消息后，美国总统布什说，萨达姆被处死是伊拉克民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他警告说，发生在伊拉克的暴力活动不会因此而终止。但其他国家领导人对萨达姆之死则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反对，有的中立，有的支持。

为应对宣判可能引发的暴力活动，伊拉克政府下令关闭巴格达国际机场，并对巴格达、迪亚拉和萨拉赫丁三省实施戒严。伊高等法庭对萨达姆作出死刑宣判后，巴格达市区相对平静的气氛被打破。一些民众不顾戒严禁令，走上街头庆祝，但也有人通过鸣枪发泄不满。从照片上看到，有一些人给萨达姆送葬，并在他的棺上盖了伊拉克国旗。

（常青：中国学士、硕士，美国博士，原文链接：<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62529.html>）

[【返回目录】](#)



10-4 陶东风：穆巴拉克下台的几点启示

“一个政权的长久稳定必须建立在民主自由、经济繁荣、社会公正的基础上，一个失去了民意的政权即使表面看来固若金汤，但一个非常偶然的事变就可以导致其下台。”



拉锯战结束了。政治强人、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11 日结束了长达 30 年的执政生涯，终于宣布下台。欣喜若狂的埃及民众兴高采烈地庆祝这场和平的“白色革命”。人们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欢呼雀跃，相互拥抱，他们在推翻“法老”中取得了似乎出乎意料、却又合乎情理的胜利。

这不仅是埃及的事情。埃及政权变更对所有国家，特别是与埃及国情存在类似之处的国家，其启示意义可谓大矣。正如路透社驻开罗记者 Edmund Blair/Samia Nakhoul 2 月 11 日在报道中说的：“这对阿拉伯世界及其他国家的独裁者是一个警示。”

启示之一，一个失去了民意的政权在今天似乎还很强大，但明天就会垮台。

穆巴拉克 1981 年当选总统，直至 2011 年，一共达 30 年（埃及总统 6 年一任）。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似乎是不倒翁的统治者却在短短 28 天的时间里迅速下台。1 月 25 日，埃及开始爆发全国性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穆巴拉克离职。1 月 29 日，穆巴拉克令政府集体辞职，1 月 31 日，新政府就职但示威继续。2 月 1 日，总统穆巴拉克宣布不再谋求连任。2 月 3 日，政府宣布总统之子不参选总统。2 月 5 日，执政党高层集体辞职，2 月 6 日，副总统与反对派对话，达成改革共识。2 月 10 日，穆巴拉克宣布把总统权力委托给副总统。2 月 11 日，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与家人离开开罗。

从这个短暂的过程可以发现：第一，貌似强大的政权一旦失去民意支持，垮台的速度是惊人的；第二，民众的怒火一旦燃烧，其革命的要求一旦形成并表达出来形成不断放大的潮流，一切妥协、让步的措施都难以奏效。

启示之二、统治合法性的根本保证是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

阿里和穆巴拉克都是军人出身，政治强人，崇尚铁腕统治。而且穆巴拉克执政期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力促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和解，埃及政局也总体保持稳定。应该说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毫无作为的总统（特别是执政前期）。但是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并没有真正的民主，在 1987 年、1993 年和 1999 年的统治选举中，仅有他自己是候选人并在这种情况下“高票”连任总统（突尼斯总统阿里也类似）。埃及和突尼斯的经济问题严重，国内物价上涨、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不满情绪增长。更重要的是，政府官员腐败，穆巴拉克政府中的官员腐败严重，丑闻四起，他本人长期“世袭传位”令民众感到强烈不满，最终酿成了此次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

由此可见，一个政权的长久稳定必须建立在民主自由、经济繁荣、社会公正的基础上，一个失去了民意的政权即使表面看来固若金汤，但一个非常偶然的事变就可以导致其下台。

启示之三，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和正常的民意表达渠道，同时又失去了民意支持的政权统治的国家，其变革常常由一件不可预测的小事引发，并迅速演变为大规模抗议，最终导致政权垮台。对于争取民主的民众而言，抓住这样的机会很重要。

埃及的抗议活动开始于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这个过程很有戏剧性。事情还得从突尼斯说起，因为埃及的这次“革命”实际上可视为它之前几周发生的突尼斯（也是一个缺乏民主的国

家)“茉莉花革命”的连锁效应。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地区西迪布吉德一名26岁的大学毕业生,因为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沿街售卖蔬菜,他的这一行为因为没有获得城管批准而被禁止。该青年以自焚抗议,伤重不治。突尼斯年轻人因失业积郁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很快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和骚乱。2011年1月12日晚开始,首都及周边地区实行宵禁。但是骚乱没有平息。13日,执政23年之久独裁总统本·阿里发表电视讲话,承诺进行全面改革,他还保证将尊重国家宪法、不参加2014年的总统大选。一切都无济于事,同日,阿里出逃。

突尼斯“革命”在埃及迅速发生连锁影响。埃及民众迅速抓住了突尼斯事变提供的时机并迅速转化为政治行动。13日,埃及首都开罗,大约50个人来到突尼斯驻埃及大使馆门前,载歌载舞,庆祝“突尼斯人民革命的胜利”。有人还趁机对总统穆巴拉克表达不满,他们高喊道:“本·阿里,请转告穆巴拉克,有一架飞机也在等着他!”25日,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开始了,直至2月11日穆巴拉克下台。

我之所以强调偶然事件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中的重要性,是因为在一个政治民主、新闻自由、民众意见包括反对意见和不满情绪得到正常、及时表达的国家,常常不会出现民主反抗情绪的长久积压,就像一条总是畅通的河流不会形成洪水灾害一样。而突尼斯、埃及以及类似国家的情况不同:这些极权国家因为缺乏舆论自由,民众平时的声音无法得到表达,政府又不采取措施倾听民众声音,解决民生问题,因此很容易导致反抗情绪的淤积,时间长了则会在一个偶然事件的触发下突然爆发出来。这就如同一条淤塞的河流,表面的平静下面是能量的不断积累,漩涡四伏,一旦决堤则洪水泛滥,不可收拾。

启示之四,军队的中立在独裁政权的演变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

极权独裁统治的国家一般都是依靠暴力、军队维持统治,突尼斯和埃及也不例外,两国总统都是军人出身。因此,军队的立场在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埃及此次“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军队的中立立场。抗议活动刚刚爆发不久,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

会就发布第一号公报，声明“不采取镇压手段”，保持中立。11日，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发表第二号公报，表示支持穆巴拉克关于政权和平过渡的计划，并承诺“保障”改革，“确保”举行“自由公正选举”，表示会取消紧急状态法。声明说，保证在局势平稳后结束紧急状态法，执行司法机构对议会选举结果的裁决，保证宪法改革和举行自由公正的总统选举。声明还要求抗议者恢复正常生活秩序，返回工作岗位。12日，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第三次发表公报，重申将实现从军管政权到民选政府的和平过渡，并表示现任内阁将留任直至新的民选政府产生。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还表示，不会取代合法政府，并将对权力过渡作出安排。声明说：“我们明了这一议题的重大和严肃程度，知晓民众要求彻底变革的诉求，最高委员会正加以研究，以实现我们伟大人民的希望。”

这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埃及军队的良好政治素质和民主意识，

启示之五，抗议民众是理性和良好的政治素质超出想象，他们不是暴民，也不是乌合之众，他们完全有自我治理的能力。

穆巴拉克下台后，并没有出现有些人担心（也许不是真正的担心，而是借口）的骚乱。埃及武装部队12日开始移除设置在开罗解放广场附近的路障。一些集会者拆除帐篷，准备回家，自发清理垃圾，清扫周边道路和绿化区域。广场附近连日来停放的坦克等军车移至街道一侧，为清理街道“让路”。一些民众帮助士兵移除铁丝网等路障。一些人在衣服上写道：“由此带来不便请谅解，但我们在建设埃及。”

参与打扫的当地人玛丽亚姆说：“这只是开始。我们有机会在国家重建中扮演角色。”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链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8807.html>）

[【返回目录】](#)



10-5 高放：斯大林怎样破坏党内民主

“苏共由民主政党蜕变为专制政党，当然不仅是斯大林个人的过错，而且是整个俄国富有专制主义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多方面历史遗产的产物，又是苏联各级领导协同促成的结果。”



一、苏联共产党在列宁领导下党内民主制度初步建立

苏联共产党最早建立于 1898 年，这一年 3 月 1 日，在明斯克市秘密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选举产生了党中央委员会，宣告了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正式建立。但是在沙皇专制政府严酷统治下，新当选的三个中央委员在大会闭幕后旋即被捕，党的各地方组织也大多被取缔。1900 年列宁从流放地逃到西欧后，只好重新筹备建党。1903 年 7 月 17 日（公历 30 日），党的二大在布鲁塞尔举行，后来又转到伦敦续开。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重新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革命活动。以后即以 1903 年 7 月 30 日作为党的誕生日。1917 年该党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1918 年改名俄共（布），1925 年又改名联共（布），1952 年才改名苏共。苏共执政 74 年，取得了重大成就。可是这个曾经领导人民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最强大的共产党，却于 1991 年悄然自行解散，被广大苏联人民彻底抛弃了，没有多少人要出面保卫它。

当今在总结苏共灭亡这个重大课题时，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苏共从列宁建党时就是一个个人专制政党。其实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实际。这里只要列举最简要的事实就可以澄清是非，辩明真相。

1847 年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建的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完全是民主政党。民主制组织原则主要体现为这样五点：党的各级领导人均是民主选举产生；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其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每三个月要向各下级组织报告一次工作，每年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定于每年 8 月召开。恩格斯说：这个“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

列宁在沙皇专制政府严密统治和严厉镇压的条件下建党，不可能民主选举产生各级领导人，党代表大会甚至不得不在国外召开，因此列宁强调“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到 1905 年俄国爆发第一次民主革命、人民争得一些民主自由后，列宁就改变提法，主张党要实行“民主制”的原则，首先民主选举产生党的各级领导人。1905 年党的三大还决定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中央全会至少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然而这在党未执掌全国政权前，显然难以做到。1905 年革命失败后党又处于逆境。1906 年列宁同意党的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1917 年 2 月俄国第二次民主革命胜利、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紧接着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而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俄共成为执政党。1908—1920 年为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激烈的内战与外战。1921 年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党的十大上列宁提出了“工人民主制”。由上可见，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列宁与时俱进，先后有过集中制、民主制、民主集中制和工人民主制四种提法。应该说，工人民主制的提法最规范。没有不集中的民主，所以没有必要在“民主”之后再加上“集中”二字；却有不民主的集中，后来民主集中制在长期的实践中经常是集中压倒了民主，民主成为过度集中的装饰品，甚至民主被破坏殆尽。

1917 年—1923 年，这头六年在列宁领导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初步创立了党内民主制，主要内容是：坚持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年会制，中央全会由双月会制变为每月召开两次；坚持党内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保护党内政治思想反对派，如左派共产主义者、军事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允许他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做不同意中央观点的副报

告，同时严禁党内有组织的派别活动；加强中央集体领导，党中央不设主席，中央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各司其职；在各级党委民主决策中坚持每人一票，平等表决；设立党的监察机关，加强对各级党委的监督。不幸列宁于 1924 年才 54 岁英年早逝！尽管他有很多新建树，然而对党内民主问题，在理论上论述不够充分，在制度上建设不够完备，在改革中设计不够周密，在党章中规定不够具体。由于这四个方面都“不够”（后面将详加说明），这就使得在列宁之后初具雏形的党内民主容易遭到破坏。

当今在总结苏共灭亡这个重大课题时，在我国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在列宁之后斯大林领导时期，由于是处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之中一国独自建设社会主义，国内又有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所以不得不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内民主不可能充分；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由于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民主化”，允许党内派别林立，并转去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才把苏共搞垮了。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在列宁领导那 6 年，更是多半处于内战外战交融的腥风血雨中，更是与资本主义列强和国内阶级敌人进行殊死斗争，依然能够依靠党内民主克敌制胜。

二、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如何变为个人集权制政党

1924 年 1 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执政长达约 30 年之久。在他任期内苏共由民主政党逐步演变成为个人集权制政党。这里从六个方面扼要分述列宁开创的党内民主制是如何被斯大林破坏殆尽的。

第一，清洗并且彻底消灭任何政治反对派。从 1924 年到 1929 年，短短 6 年之中先后开除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和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在 1936 年前后的大清洗中进一步破坏法治，用逼供信、诱供的手段诬陷他们是“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杀人犯”予以处决，连 1929 年已经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斯大林也要亲自指挥苏联情报机关派人于 1940 年在墨西哥把他暗杀掉。昔日亲密的布尔什维克老战友凡敢于与斯大林持不

同政见者无不成为阶下囚和枪下鬼。斯大林对党、政、军、共青团、工会、科技人员和文艺工作者以至平民百姓中凡是反对他的思想观点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甚至以“人民公敌”定罪。据苏联内务部 1954 年起草的有总检察长、内务部长、司法部长共同签名的统计报告，从 1921 年至 1954 年，被判处反革命罪的罪犯共有 3770380 人，其中死刑 642984 人，25 年以下劳改与监禁 2369220 人，流放和驱逐出境 765180 人。苏联在 1918 年、1924 年制定过两部宪法，1936 年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时又通过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宪法。可是实际上有宪法却没有法治，有宪法却缺少宪政。一个民主政党，党中央内部在决策中见仁见智难免会有意见分歧。凡是在党代表大会上经过民主讨论表决，拒不服从多数人通过的决议者，顶多开除党籍。可是斯大林却网罗罪名，把他们作为敌我矛盾加以消灭，其结果只能把党变成一言堂、一人专政。

第二，破坏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年会制以及中央全会定期会议制。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领导下遵照党章，每年都召开党代表大会。可是从 1925 年党的十四大之后，党代表大会相隔时间越拉越长，从相隔 2 年、3 年、4 年、5 年，甚至到相隔 13 年之久才召开。斯大林于 1927 年党的十五大修改党章，把党代会年会制改为每隔 2 年召开一次，1934 年党的十七大又改为每隔 3 年召开一次，1952 年党的十九大再改为每隔 4 年召开一次（到 1971 年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改为每隔 5 年召开一次）。即便不断修改党章，把年会制改为每隔 2 年、3 年、4 年召开一次，依然不断违背党章。至于党代表会议本来也是实行年会制，它在两次党代会之间召开，其权力小于党代会，大于中央全会，在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期党代表会议的召开甚至相隔时间更长，如 1941 年举行第十八次党代表会议，而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是到 1988 年才揭幕，相隔几乎近半个世纪。还有中央全会相隔的时间也愈益增长。从党章规定来看，1922 年定为中央委员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全会并向各省委分发一次关于自己活动的书面报告；1934 年就改为每 4 个月召开一次全会，而提供书面报告则从 1925 年就改为模糊的说法，“定期把自己的工作通告党的各级组织”。到 1952 年，中央全会又改为每 6 个月召开一次。实际上中央全会经常延期召开。例如 1940 年 7 月之后相隔 3 年半之久才于 1944 年 1 月召开；1947 年 2 月之后，相隔 5 年半之久才于 1952 年 8 月召开。更为严重的是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自从清除了反对派之后越来越变成“一言堂”，越来越变成对斯大林言听计从、歌功颂德的会议。

第三，在政治局实行个人专断。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年会制被破坏，这表明党的权力中心、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已经转移到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又一再被延期，甚至相隔 3 年、5 年之久才召开一次，这表明政治局实际上已经成为党的权力中心，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按党章规定，政治局本来是和组织局、书记处并行、并列、并重的党中央 3 个常设机构之一。可是斯大林时常撇开组织局，实际上由政治局包揽、包办一切，把政治局变成凌驾于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及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央政府）之上的党国最高权力机关和权力中心。1925 年 12 月 23 日斯大林在党的十四大上公然这样说，“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除了中央全会以外，它是高于一切中央机关的。而最高机关是全会”，“在我们这里全会决定一切”。这种说法是违背党章的。苏共党章历来明文规定“党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只是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所以只能说党代表大会决定一切，而并非中央全会决定一切。当中央全会不按期召开时，实际上变成政治局决定一切，难怪斯大林敢于直言不讳地说“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如果在政治局内部还实行集体领导、每人一票平等表决，那还算是寡头专断。可是斯大林违背党章，在政治局内部又搞了 5 人小组。早在 1919 年 3 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政治局对不容拖延的问题做出决定，并且就自己两周内的全部工作情况，向中央委员会定期全体会议做报告”。后来在党章中从未规定政治局的人数和会期。从 1925 年十五大至 1939 年十八大，政治局委员一直是 9—10 人。1952 年十九大政治局改称主席团，委员增至 25 人，享有最高权力。沿用了 33 年之久的政治局为什么要改称主席团呢？在大会作修改党章报告的赫鲁晓夫一语道破真相。他说：这是“因为‘主席团’这个名称更符合于现在的政治局实际上行使的职权”。即是说从今以后公开废弃早已名存实亡的组织局，使党中央主席团成为名实相符的党政最高权力机关。然而不论是政治局或主席团，都极少开会。实际上斯大林大都是召集其中的几个人，向他们宣布重要决策，要他们分头去办理。1971 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透露了真情。他说：“无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都没有有规则地工作过。可是斯大林同他内圈的定期会议却像钟表装置一样，到时必定举行。”斯大林一般是每隔二三天或者更多天，就召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几个人到他的别墅进晚餐。通常是边吃边谈，主要是斯大林独自高谈阔论，发号施令，与会者洗耳恭听，边听边记，心领神会，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轻易发表什么新见，也顾不上认真吃饭。

第四，改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使党中央委员会和总书记没有机构能对之实行监督。1920 年建立的中监委，本来是与中央委员会并行、并列、并重的，同样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的一个中央监督机关，其任务和职责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职权的行为，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的谣言和流言蜚语现象作斗争；要“使对党员的罪行和过失提出的一切控诉和申诉都得到适当的处理和解决”；“要加强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监察”。

斯大林先后迈出四步来改变中央监委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第一步是监督监委。本来列宁是要中监委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以监督其工作。然而 1924 年 5 月（列宁刚过世四个月）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的决议竟倒转过来，决定“党委员会必须派代表参加监察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和它们的全部工作”。第二步是 1934 年 2 月召开党的十七大，进而决定取消中监委，改变为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从此党中央委员会（包括政治局、总书记）就不受任何机构监督了。第三步是到 1939 年党的十八大又把党监委改为设在中央委员会之内，受中央委员会领导，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监委成员。第四步是在 1952 年党的十九大上，干脆把党监察委员会改组为党中央委员会的党监察委员会，即直接隶属于党中央的一个部门机构，其任务是监督党中央决议的执行和检查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这样，监委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就完全改变了。总书记的个人集权制还拥有了一个监督全党和地方贯彻执行其个人意志的机构。这样，党中央委员只由总书记个人对之实行监督，总书记则无人能对之实行监督了。

第五，斯大林把列宁开创的各种党内民主制度破坏之后，进一步加强以党代政制和个人集权制。本来在列宁领导执政时期，列宁只以党的政治局委员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担任（苏共中央从未设立军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由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充任。可见当时党、政、军三大权是分归 3 个人掌管，在政治局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这犹如三驾马车，由 3 位能人各自驾辕，虽有龃龉，尚能协调，力求齐心协力，齐头并进。到斯大林彻底斩尽杀绝党内各个反对派、独占鳌头之后，他的权力欲进一步膨胀，还要进而独揽党政军三大权。1941 年 5 月他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6 月卫国战争爆发后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1934 年苏联废除

共和国军委，1941年6月新设国防委员会），战后取消国防委员会，他又兼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这样他就把列宁当年确立的党政军三权分立的民主分权体制改变为党政军三大权统一于一身的个人集权体制。同时他从20年代末起就别具匠心，逐步独自掌管国家安全部门（从“格别乌”到“克格勃”），以保卫国家安全为名，实则用以作为严密监控党政军民思想、剪除异己的得心应手的工具。斯大林在独揽大权之后，还要独领风骚，在文化思想界大兴个人崇拜之风。党内、国内盛行吹捧领袖之风，谁颂扬得多、颂扬得高，谁就越能得到提拔重用。斯大林用文化部门的“个人崇拜”和安全部门的“个人忠诚”这一文一武两手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根本维护并巩固其个人集权制。

第六，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国家还率先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他实现这“两制”未必是早有预谋、事先设计的，而是个人权力欲不断膨胀，又渡过权力危机的必然结果。苏共党章和苏联宪法从未明文规定党政领导人的终身制和任期制，这样就给领导人可以不断连选连任留下法定的广阔空间。斯大林自1922年4月就任总书记后，当年末翌年初就遇到了列宁要调离他这一要职的第一次权力危机。经他在党中央赢得了多数人支持，终于留任。他进而清除了党内的各种反对派，1929年提前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在实践中造成重大损失，这引起党内不少人对他的领导不满。于是在1934年初举行的党的七大上他遇到了第二次权力危机。表现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斯大林少得270多票，列当选中央委员名单末位，而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只以3票之差居于首位。只因中央委员是等额选举，斯大林才得以当选。与会代表1225人，可见约有五分之一代表反对他当中央委员，更遑论当总书记了。斯大林的亲信卡冈诺维奇急忙出面，暗箱操作，命令销毁反对斯大林的大部分选票，最后在大会上宣布的选举结果是反对斯大林的和反对基洛夫的都是3票，才使他进而在中央委员会上又当选总书记。渡过第二次权力危机之后，他通过大清洗彻底消灭威胁他权力的所有的人，到1941年5月又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任国家政权机关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把政府首脑大权攫取到手。6月法西斯德国入侵后，他出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集中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统一领导战时党、政、军、工、团的活动。他领导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战后又较快恢复了国民经济，这样他的威望登峰造极，他自己也更加自信自负，更没有要急流勇退之意。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不久人世，所以从未明确对人谈过他的接班人问题。但是1952年10月举行党的十九大时，他要马林科夫取代他作中央工作报告（从1924年党的十三大起一

一直都是他自己作中央工作报告），在他提出的十九大后中央领导人名单中马林科夫名列首位，人们都认为马林科夫显然是他意中的接班人。后来他嫌马林科夫过于软弱，尚未确定何人接班，天有不测风云，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中风猝死。他担任总书记31年之久，担任政府总理和全军最高统帅也有12年，实际上是领导职务终身制。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明显带有君主专制色彩，这“三制”正是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制两种政治体制的三点根本区别（民主共和制是实行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制约制、权力限任制与权力选举制）。

斯大林实行的这种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不仅破坏了共产党党内民主，而且也破坏了苏联的苏维埃民主。党权高于民权，以党代政的体制使作为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苏维埃成为“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斯大林开创的这“三制”以及以党代政制、一党专政制、高干特权制、监控干群制等等，在苏联代代相传，有的甚至愈演愈烈。缺少社会主义民主的种种体制长期无法进行体制内改革，到80年代后期苏联国内涌现了众多政治派别和政党，纷纷要求民主化，个人专制或者寡头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斯大林开创的这“三制”等等还推广到其他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国家，也破坏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其后果是严重的，切不可等闲视之。

三、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为何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

苏共为何会形成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呢？为何会由民主政党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呢？这也是有历史与现实、客观与主观、群体与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列宁遗留下来的党内民主的遗产不够丰厚，容易被暴风骤雨吹散冲掉。如前所述，关于党内民主问题列宁在理论上论述还不够充分，在制度上建设不够完备，在改革中设计不够周密，在党章中规定不够具体，这样不免留下了不少漏洞。

第二，沙俄君主专制和对外扩张的政治文化传统是苏共变为个人集权制政党更深远的原因。俄国自 1497 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建立了封建农奴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起，俄国的君主专制统治和对外军事扩张长达 420 年之久。俄国于 1861 年从上而下废除了农奴制之后，现代资本主义才发展较为迅速，然而软弱的资产阶级，长期依附沙皇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未能建立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民族政治文化遗传基因、民族负面政治文化传统对一个民族发展的长远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第三，历史遗留与现实存在的经济结构更是苏联形成并且长期延续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沙皇俄国尽管已经发展了一批资本主义大工业和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经济（1913 年现代工业约占国民经济 42%），然而依然给苏维埃俄国留下了大量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苏联共产党长期不认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计划经济，实际上苏联确立的是依靠行政法律手段构建的、带有半自然经济色彩的统制经济。这种条条块块分割、自我封闭、少竞争的统制经济，不但使苏联经济缺少活力，农业长期上不来，而且正好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苏联领导人长期以来把商品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坚决反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也是因为害怕商品市场经济的竞争张力势必动摇、冲垮个人集权制和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第四，社会主义国家特殊培植的党政军官僚体制和高薪特权官僚集团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1871 年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采取两个办法、确立两种制度以保证官员是社会公仆而不会变为社会主人（老爷），即实行官员选举与罢免制、官员与熟练工人同等工资制（官员之间、工人之间工资差别只有 5 倍），这也是防止社会公仆变质的两项重要保证。十月革命后头几年列宁非常重视贯彻实行巴黎公社的这两条宝贵历史经验。可是后来在斯大林执政时期逐步背离了这两大原则。选举限于苏维埃代表、党代表和党政主要领导人，但是苏联采取等额选举，没有差额，没有竞选，而且候选人的产生还要由上级党委严加控制，这种选举徒具投票形式，实际上是变相的任命。苏联没有发扬巴黎公社开创的工人阶级政权的优秀民主传统，却继承了沙皇专制制度官僚层层任命制、权贵等级制和高薪特权的衣钵。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实行任命制、等级授职制，于是逐步形成了

依权仗势、等级森严的党政军官僚体制，它成为个人专制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而且党政军官僚的最高工资待遇与熟练工人工资的差别由 20 世纪 20 年代的几倍扩展到 30 年代的 30 多倍，50 年代的 50 多倍，80 年代的 100 多倍，越是高级的领导干部，在住房、汽车、物品供应等方面享有的特权就越多。总之，苏联从 30 年代起形成了党政军高薪特权官僚集团。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和权力过度集中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他们可以从这种政治体制中分享到不等的特权。

第五，苏联共产党特别营造的由党严密控制的文化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基于旧俄国文化十分落后的实际情况，十月革命后列宁特别重视文化建设，他着意批评了当时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极左思潮。这些人否定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外国一切文明成果，认为在“特殊的人工实验室”里，就可以制造出“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主张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方针应该是：充分发挥旧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作用，对他们要采取耐心谨慎的态度；对艺术创作部门不能作“繁琐的管束”，要允许他们有相对的自主权，使其“保持自治”。可是到 30 年代，随着在经济、政治领域转向“左”的路线，文化领域也越来越“左”。党的领导人对文学艺术创作、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研究加以严密控制，对各种不同风格和学派乱贴阶级标签，乱扣政治帽子，对被批判者采取各种行政和法律惩罚、惩治措施，各种社会文化团体在繁荣文化中的作用被大大削弱，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直接包办文化的权力急剧膨胀。连苏联历史教科书也要由斯大林等领导人来拟定提纲，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是非也要由党中央领导人来做结论。这样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就进一步发展为以党代文的文化体制。结果是营造出了党文化：一方面文化必须按照党领导人的观点得到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只能是歌颂党及其领袖的伟大，其核心是鼓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种党文化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显然是为维护个人专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奠定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

第六，斯大林个人的特点对于苏联共产党从民主政党变为专制政党起了关键性的催化作用。列宁曾经是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流亡西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从事革命活动达 15 年之久，有民主素养。与列宁的经历很不一样，斯大林是土生土长的职业革命家。他于 1879 年出生于格鲁吉亚一个鞋匠之家，在东正教教会中学读书时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在地下斗争中曾经七次被捕，六次被流放。他勤奋自学，思维敏捷，对理论问题有浓厚兴趣，观察问题尖

锐深刻，口头与文字表述都简洁明快，意志坚强，办事果断；然而思想方法主观片面，思想认识狭隘固执，思想作风孤傲粗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自由观以及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与自由的实践了解不多。他从亲身经历的 10 多年的地下斗争和监狱、流亡生涯中深切体会到的都是统一集中、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嫉恶如仇、坚持抗争、决不妥协等感悟和经验，却很少受到集思广益、尊重少数、宽待反对者、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等现代民主与自由社会生活准则的教育与熏陶。所以，一旦他掌握党和国家大权之后，很容易习惯性地按照自身的历史经验待人接物，处世办事。随着地位的上升、权力的增大，他的急躁、粗暴、咄咄逼人、盛气凌人等毛病暴露得更充分，使列宁感到他“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能不能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感到“没有把握”。苏共由民主政党蜕变为专制政党，当然不仅是斯大林个人的过错，而且是整个俄国富有专制主义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多方面历史遗产的产物，又是苏联各级领导协同促成的结果。后来几任领导人的改革措施不得力，最终导致改革方向有错误，这固然对苏共的灭亡要负直接的责任，但是其根源在于这种过度集权的体制积重难返，盘根错节，涉及众多官僚特权集团的权益，遇到重重阻力，难以寻求、开拓一条从发展党内民主着手，进而发展人民民主，取得体制内改革成功之路。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失望，于是社会上要求体制外改革的声浪越来越强大。结果到 1989 年—1992 年间终于使苏联和东欧各国长期执政的专制型的共产党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抛弃了，全军覆没了，这是何等惨痛的教训！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鉴于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党 2002 年十六大第一次明确、响亮地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2007 年党的十七大进而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这是我们党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决心重新振兴的重要论断。然而党内民主并非空泛的理论和空洞的口号，而是包含许多具体的内容和举措。只要细心考察列宁初创的党内民主制后来怎样被破坏殆尽，就不难领悟到应该如何结合我国实际既坚持马列主义的党建理论和实践，又向前去发展并完善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制。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200页。



- 2、《列宁全集》第7卷，1985年版第167页。
- 3、《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1964年版第52~54页。
- 4、据塔斯社莫斯科1992年4月23日电。
- 5、《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年版第333页。
- 6、《斯大林全集》第7卷，1958年版第326页。
- 7、《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1954年版第566页。
- 8、《赫鲁晓夫言论》第二集，1964年版第362页。
- 9、《赫鲁晓夫回忆录》，1988年版第429页。
- 10、《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1964年版第70页。
- 11、《列宁选集》第四卷，1995年版第782~783页。
- 12、布拉诺夫：《被篡改的列宁遗嘱》，1999年版第24~25页。
- 13、《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1964年版第437页。
- 14、《苏联共产党党章汇编》，1982年版第73页。
- 15、《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编》，1988年版第426页。
- 16、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1981年版第251页。
- 17、《列宁选集》第四卷，1995年版第782~783页。
- 18、《列宁选集》第四卷，1995年版第745~746页。
- 19、高放：《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的来龙去脉》，新华文摘2001年第10期。
- 20、丘耶夫：《莫洛托夫密谈录》，1992年版第326页。
- 2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7、50页。

另有提到：苏联从 1921 年至 1954 年被判处反革命罪犯总数与其中被判死刑、劳改与监禁、流放与驱逐出境三项相加对比，多出 7004 人，原因何在？能提出这个疑问，足见读者相当认真细心。实际上这是排印差错所致。当时被判处反革命罪犯总数应是 377.738 万人，其中死刑 64.298 万人，劳改与监禁 236.922 万人，流放与驱逐出境 76.518 万人。这里后三项相加与总数就完全一致。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博士生导师。原文链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5762>）

[【返回目录】](#)



10-6 王从圣：苏哈托 32 年的独裁统治为何三天之内倒台？

“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人们的一个普遍接受的良好政治制度，但很多人担忧推翻独裁统治会导致大规模政治动荡乃至内战。印尼民主过渡的成功打消了人们的这一顾虑。”



印度尼西亚，这个由上万个岛屿构成，有着两亿多人口，上百个民族，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并同时拥有大量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信徒的国家，能够如此顺利地实现民主过渡，大大加强了民主国家的阵营，也更坚定了人们对民主宪政制度的信心。在印尼民主转变中最大的代价是发生在 1998 年 5 月的暴乱，有人估计有超过 1000 人在暴乱中死亡，其中华人受到了特别严重的伤害。面对如此灾难，作为中国人尤感痛心。然而，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民主发展的历程，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大国，以如此小的代价实现民主过渡实在并不过分。如果我们再看看直到今天（2005 年）其他国家，如乌克兰、格吉亚等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历程，我们会进一步发现：民主宪政的实现代价越来越低，以往人们通常看到的政治动荡甚至内战的危险越来越小了。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民主观念在今天已经成为全世界不容置疑的共识。二十世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地对社会制度进行了试验，各种主义层出不穷：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人们在试验这些主义的时候付出了几千万、上亿人的生命代价。到二十世纪末，人们终于明白：只有民主宪政是人类社会可能实现的最理想制度，尽管这一制度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有那么多的不如意。民主宪政制度的根本优点在于：这一制度提供了发现自己缺点的可能，也提供了弥补缺陷的可能。它并不声称自己是尽善尽美的，相反，它认为任何人、任何党派、任何制度、任何主义都是有局限性的，它通过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和竞争性的选举来不断地完善自己，发展自己。保守地说，这一制度至少几百年内我们无法超越。将来，即便我们发展出更好的制度，也只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而不是抛开人类的历史成就另起炉灶。中国古人说：治

大国若烹小鲜。我们切不可动则以万乘之国做各种花样翻新的试验。尤其对落后国家，人们没有理由试验前无古人的新制度，最为稳妥的是建立已有充分经验教训的民主宪政制度。

1. 貌似强大的独裁统治实则不堪一击。

1998年3月10日，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选举苏哈托为下届总统。次日，苏哈托正式宣誓就任印尼总统，任期五年。这是他连续第七次担任总统。此时距离1966年3月苏加诺被迫把行政管理权移交给苏哈托已经整整三十二年了。苏哈托已经77岁，垂垂老矣！独裁者很少有主动下台的，一则人的权力欲望没有止境，二者独裁制度下下台的统治者人身安全和社会地位都很难得到保障。

然而，老迈的苏哈托遭遇到严重的挑战。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印度尼西亚。印尼发生30多年来严重的暴乱。5月16日，印尼军方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雅加达连日暴乱死亡人数为499人，军方发言人莫孔唐根在会上表示："大部分遇害者都是妇孺，亦包括购物中心雇员。"

正在埃及参加15国首脑会议的苏哈托总统提前一天回国，力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平息骚乱。正当局势趋于平缓之际，印尼总统苏哈托领导的专业集团的一个主要派系，突然站出来反对苏哈托，使得苏哈托的统治更进一步陷入危机境地。专业集团主要派系之一的柯斯哥洛（KOSGORD）派发表一项声明，要求苏哈托归还国会对他付托的总统职权。柯斯哥洛派的一名领袖说："假如他不和平地下台，那么我们就必须迫使他离开。"这是专业集团内部的第一个反叛迹象。这个一度是不可一世的政治机器，已统治印尼数十年。

而当苏哈托处于30多年来最脆弱的时刻，反对派领袖赖斯宣布成立一个由56人组成的"人民议会"，成员包括要求苏哈托下台的著名反对派人士。赖斯也正和反对派的前总统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协调。在印尼这次暴动中，政治异议领袖梅加瓦蒂一再公开呼吁，要军警不要以武力对付示威民众，再度受到各方瞩目。梅加瓦蒂是印尼国父苏加诺的女儿，大学没毕业，

未从政之前，梅加瓦蒂只是平凡的家庭主妇，凭着"苏加诺女儿"所带来的名气，她在 1987 年首度当上国会议员，后来又一度出任反对党"印尼民主党"的党魁。

5 月 18 日，印尼局势的天平出现了新的倾斜。这一天，长期以来一直忠于苏哈托的国会议长哈尔莫科在印尼国会上首次公开呼吁总统苏哈托要为这次大暴乱引咎辞职，军方随即表示国会的要求属于违法，而刚见平静的市面则再转紧张，军队在街上不停巡逻，各地可见有大规模的学生示威，国内的主要反对派"回教运动"更表示苏哈托在数周内便会倒台。

在这危急时刻，苏哈托在寓所内曾与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国防部长维兰托、内政部长、国务部长及军方总参谋长进行半小时的会议。外界盛传，此前苏哈托一整夜都在努力说服军队支持他行使赋予他的特别权利，其中包括宣布军管，但没有成功。不过。军方 5 月 18 日宣布不支持议长哈尔莫科的主张。

5 月 19 日，印尼局势再次出现新变化，总统苏哈托表明暂时不愿下台，但公开承诺尽快举行新一届大选，他自己将不会角逐连任。苏哈托与社会知名人士及武装部队领导人举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协商，然后他出现在记者面前。苏哈托在历时 15 分钟的电视演说中出人意料地表示，他将根据为选举草拟的新法例尽快举行大选，但他不会角逐连任。不过，苏哈托再三声明他不会辞职，理由是此举既不负责任，又不能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况且政治的传承必须依宪法而行，否则流血事故必随之而来。

19 日这一天，印尼的学生举行了通宵示威活动，逾 15000 名大学生重重包围首都雅加达的国会大楼，并誓言准备为改革而死。入夜后，全国各大学的校园仍被示威学生占据，他们表示，除非苏哈托下台，否则不会撤走，军方暂时未见有任何的干预，来自加里曼丹和茂物的学生夜后亦加入集会行列。手持横幅、标语及印尼国旗的学生早上便在国会外举行集会，他们不停高呼民主的口号，另有数百名工人加入示威行列。

印尼"回教运动"组织领袖及主要反对派政客赖斯，呼吁民众参加与印尼学生一起大游行。据称他有 2800 万回教徒及草根阶层的支持。

5月20日，印尼军方出动15万部队在雅加达各地部署，试图阻挠反苏哈托百万群众示威游行。数千名学生彻夜占据国会大厦，要求当局励行政治改革。在日惹，有数千名学生不理睬禁令展开和平示威。

赖斯20日前往雅加达国会大厦，接受上万名反政府示威学生的鼓掌欢呼，并向他们发表演讲。他声称苏哈托的气数已尽，呼吁国会学习学生的勇气，希望全国三军作一抉择：究竟要选择靠拢家财万贯的苏哈托和与他朋比为奸的两百个心腹、亲友，抑或选择站在印尼2亿人民这一边。

面对国内、国外强大压力，印尼总统苏哈托终于宣布辞职，结束其对印尼的32年独裁统治。5月21日上午10许，在雅加达独立宫，执政30多年的铁腕人物苏哈托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他用颤抖的声音透过电视说："我决定宣布卸卸印尼共和国总统职务，自1998年5月21日此刻立即生效。根据1945年宪法有关规定，集教授、医生、工程师于一身的现任副总统哈比比将继任总统职务，任期从1998年至2003年为止。"苏哈托在女儿的搀扶下，乘车离开总统府。哈比比即在最高法院法官见证下，手举着可兰经正式宣誓就职。[1]

2.原独裁政权体系内的领袖成为重要的改革过渡人物。

苏哈托的下台标志着统治印尼三十二年的独裁统治的结束，但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继任总统哈比比与苏哈托有非同寻常的关系。在哈比比14岁的时候，苏哈托就认识哈比比，并与其家庭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苏哈托将哈比比从德国召回国内并一直栽培成为副总统的。在推翻苏哈托独裁统治的运动中，人们也要求哈比比一同下台。但大多数主流政治家还是接受将哈比比作为一个过渡人物。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印尼政治的连续性和民主过渡的平稳。

危难时刻出任总统的哈比比非常清楚，印尼人民呼唤政治改革，结束专制独裁体制。为顺应民意，哈比比在担任总统短短的十七个月内，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首先，在哈比比执政时期，印尼政府几乎取消了所有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和条例，积极推动新闻自由。取消对出版行业的执照管制。即使新闻媒体对政府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政府也不再可以像过去一样随意关闭新闻媒体。学术界也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由于放松了对新闻出版业的管制，大量的报纸、杂志应运而生。在哈比比执政的第一年内，出版的媒体由 280 种增加到 1398 种。电台由 9 家增加到 1070 家，私人电视台也增加了 5 家。

其次，实行政党自由，霸权政党体制彻底瓦解。在苏哈托执政时期，只有三个政党可以从事政治活动，即专业集团(Golkar)、印尼民主党(PDI)和团结建设党(PPP)。哈比比政府在执政初期就宣布允许成立任何政治党派，只要这些党派不以宗教、种族等因素为分水岭而引起社会分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专业集团占据霸权地位的三党体系彻底摧毁。1999 年 6 月大选中，一共有 48 个政党参加了国会议员竞选。

再次，弱化军方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军方和公务员体系中立化。在哈比比执政期间，印尼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减少军方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军方在国会中的席位从 75 个减少到 38 人。警察部门从武装部队分离出来。1999 年 11 月，文官出身的苏达梭教授取代维兰托担任国防部长，开创了文官出任此职务的先河。

又次，国会和人民协商会议的权力相对加强。在苏哈托时代，国会和人协等机构形同虚设。苏哈托通过控制军队、专业集团，从而控制国会和人协。哈比比接任总统后，立即通知当时的人协主席哈莫可，与议会领袖举行磋商会。在处理东帝汶问题上，哈比比详细地向立法机构解释行政当局政策转变的背景和主要的政策内容，以便争取议会的支持。1999 年 10 月哈比比向人协特别大会作述职报告，结果以 322 票对 355 票的结果被人协否决，哈比比因此丧失了连任总统的机会。这也表明哈比比并不试图操纵民意机关而是尊重民意机关的决定。

最后，扩大了地区自主权。哈比比还认为，在中央集权统治下，许多地方，特别是资源丰富的地方，谴责中央政府在进行了不公平的经济剥削，认为这种剥削与典型的殖民剥削并无区别。这种“不公平的剥削”正是亚齐和西伊里安等地社会动荡的根源。军事镇压只会使矛盾进一步激化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正确的做法是加快中央政府下放权力到地方政府的进程。[2]

哈比比的改革措施使印尼实现民主过渡有了良好的开端，为民主选举创造了条件。在 1999 年 6 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执政 30 多年的专业集团败给了梅加瓦蒂领导的坚决主张改革的印尼民主斗争党。反对党赢得大选是民主过渡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次选举是印尼三十余年来最公平的一次选举，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许。

3.原有体制成为政治秩序的有效规范。

然而，在随后几个月进行的总统选举中，瓦希德审时度势，巧借专业集团和军方势力赢得人民协商会议举行的总统选举，成为印尼第四任总统。随后，他再次施展娴熟的政治技巧，支持大选前呼声最高的梅加瓦蒂出任副总统，并确保其当选，从而很好地化解了危机，维护了大局，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瓦希德和梅加瓦蒂联手执政是众望所归，也为印尼进一步推进民主进程，确保政治稳定创造了条件。

没有强大政党支持的瓦希德，最终还是被拉下了马。2001 年 7 月 23 日下午，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人协)特别会议以 591:0 的投票结果，罢免了执政 21 个月的总统瓦希德，推选副总统梅加瓦蒂出任印尼第五任总统，任期到 2004 年 10 月。印尼在宪政的轨道上继续蹒跚向前。

4.民主宪政终成正果。

2004 年 10 月，印度尼西亚历史上首次总统直接选举经过两轮投票的较量，民主党候选人苏西洛在第二轮投票中，以近 61% 的得票率遥遥领先现任总统梅加瓦蒂，成为印尼独立宫的新主人。

至此，无论从经验上，还是从政治理论上，我们都可以认定：印度尼西亚已经稳步迈入了民主宪政制度的轨道。在 2004 年第一轮总统直接选举中，全国 1.53 亿的选民中 82% 参加了



投票。这两次选举基本上是在自由、平静、有序的气氛中进行的。担任选举观察员的美国前总统卡特称赞说，印尼出色地完成了民主过渡。

自苏哈托垮台以来，印尼政府经历了三届政府的变动，这三次政权更迭虽然伴随着街头抗争和社会动荡，但总的说来权力转移基本上没有脱离法律程序和民主游戏规则轨道。在后两次权力转移中，曾经出现过政治危机，但都在民主和法律的框架内成功地度过了。1999 年第一次人协和国会自由选举后，赢得国会第一大党地位的是梅加瓦蒂的民主斗争党，但登上总统宝座的却是国会中位居第三大党的瓦希德，梅加瓦蒂只得到了副总统的位置。民主斗争党尽管愤愤不平，但对此没有发难，而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果。第二次危机是 2001 年 7 月，瓦希德遭人协弹劾时，瓦希德曾下令，冻结国会，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出现了总统和立法机构对峙的局面。但军方以忠于宪法为由拒绝执行紧急状态令。其后，最高法院也做出判决，宣布瓦希德的命令违反宪法。结果，人协投票通过对于瓦希德的弹劾案，并宣布梅加瓦蒂接任总统。这又一次使印尼依照民主的程序度过了一次危机。

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人们的一个普遍接受的良好政治制度，但很多人担忧推翻独裁统治会导致大规模政治动荡乃至内战。印尼民主过渡的成功打消了人们的这一顾虑。

5.最大的伊斯兰国家也能实现民主宪政。

印度尼西亚，这个由上万个岛屿构成，有着两亿多人口，上百个民族，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并同时拥有大量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信徒的国家，能够如此顺利地实现民主过渡，大大加强了民主国家的阵营，也更坚定了人们对民主宪政制度的信心。在印尼民主转变中最大的代价是发生在 1998 年 5 月的暴乱，有人估计有超过 1000 人在暴乱中死亡，其中华人受到了特别严重的伤害。面对如此灾难，作为中国人尤感痛心。然而，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民主发展的历程，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大国，以如此小的代价实现民主过渡实在并不过分。如果我们再看看直到今天（2005 年）其他国家，如乌克兰、格鲁

吉亚等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历程，我们会进一步发现：民主宪政的实现代价越来越低，以往人们通常看到的政治动荡甚至内战的危险越来越小了。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民主观念在今天已经成为全世界不容置疑的共识。二十世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地对社会制度进行了试验，各种主义层出不穷：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人们在试验这些主义的时候付出了几千万、上亿人的生命代价。到二十世纪末，人们终于明白：只有民主宪政是人类社会可能实现的最理想制度，尽管这一制度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有那么多的不如意。民主宪政制度的根本优点在于：这一制度提供了发现自己缺点的可能，也提供了弥补缺陷的可能。它并不声称自己是尽善尽美的，相反，它认为任何人、任何党派、任何制度、任何主义都是有局限性的，它通过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和竞争性的选举来不断地完善自己，发展自己。保守地说，这一制度至少几百年内我们无法超越。将来，即便我们发展出更好的制度，也只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而不是抛开人类的历史成就另起炉灶。中国古人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我们切不可动则以万乘之国做各种花样翻新的试验。尤其对落后国家，人们没有理由试验前无古人的新制度，最为稳妥的是建立已有充分经验教训的民主宪政制度。

[1]本文史料依据常松慕蓉编著：《黑色的五月》之“苏哈托下台，铁腕统治尽尘埃”，来自网上。

[2]张祖兴：《评哈比比执政时期印尼的政治改革》，载《东南亚研究》2002年第2期。

（王从圣：律师。原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413.html>；拓展阅读：卡扎菲与他的同类 10 位著名独裁者的结局 <http://special.caixin.cn/2011-10-21/100293612.html>）

[【返回目录】](#)



【政】

10-7 译言网：《外交政策》平壤之春

“当阿拉伯之春变为阿拉伯之夏时，朝鲜或许认为自己已经躲开了危机，但是，封阻跨越边境流入的信息也许在今后会越来越难。”

金正日的统治会成为下一个倒下的独裁政权吗？别指望了。

首尔报道——二月中旬，当利比亚刚刚掀起对抗卡扎菲的起义潮流时，约 200 名在当地工作的朝鲜人发现自己身陷困境之中。与那些在中东其他地区工作的同胞一样，他们进入利比亚充当廉价医生、护士和建筑工人。然而，随着反抗活动的展开，现在，朝鲜政府拒绝他们回国。

根据报道，这些工作人员目睹了这场推翻卡扎菲独裁政权的彻底革命，有可能会将起义的火种带回本国，出于这种恐惧，平壤政府命令他们留在利比亚。“很明显，这是在害怕这 200 名工人引发病毒效应，将利比亚的所见所闻带回朝鲜，”蒂姆·皮特斯（Tim Peters）说道，他是帮助朝鲜难民的“韩国辅助组织”（Helping Hands Korea）的创立者。

大规模的起义，对任何独裁者来说就像是横行的瘟疫一样制造麻烦。在朝鲜看来，在两个同样的遁世政权埃及和利比亚爆发的革命已经让同样飞速燃烧的民主导火索引向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无出其右，第一条防线还是信息封锁。虽然北约空袭卡扎菲政权让国营媒体发出了一系列刺耳的谴责，平壤对阿拉伯的革命保持了绝对的沉默。同时，它还加强了边界管控以防止“非官方”的消息渗透进来。



皮特斯说，北京和平壤都对中东的政治觉醒可能导致的“潜在的病毒效应”感到紧张。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以来，为了阻止非法越境，经常被叛逃者和走私者用作逃亡路径的松散的中朝边界就由摄像头、热量和运动感应器控制起来。他说，这种管制措施在阿拉伯起义爆发以后只会更加严格。“两边下意识的反应都是加强控制、收紧限制——基本上是设防状态，”皮特斯说道。彼得森国际经济学会的马库斯·诺兰德表示今年限制措施已经扩展到了那些持有合法许可前往中国从事贸易的人身上。

最近几个月，朝鲜对拥有中国手机也采取了管制措施——这是一种获取外界信息和消息的关键来源。朝鲜自有的手机服务由埃及的奥斯康电信提供，拥有 500000 用户，无法拨打国际电话，也处于严密监视之下。一家私下带出朝鲜视频报道的日本出版物《临津江（Rimjin-Gang）》的首席编辑和发行人汪石丸（Jiro Ishimaru）告诉笔者边界地区怀疑有“超过 10000 人”使用中国手机，可以拨打国际电话，这也是获取外界对朝鲜报道的重要途径。

通过中国边界将信息带出带入朝鲜的叛逃团体朝鲜知识分子团结组织（North Korea Intellectuals Solidarity, NKIS）称最近在与中国接壤的北咸镜道（North Hamgyong）和两江道（Yanggang）已经开始催促居住者自动交出中国手机，否则将面临惩罚。这一做法旨在防备“传播资本主义思想和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人”，该组织引用朝鲜内部的消息来源说道。汪石丸确认该地区在中东反叛开始之后已经处于严厉的政治管制之下。“他们开着车带着德国制造的无线电探测器来跟踪并捕获使用者，”他说道。但是这也许还远远不够：“就算有这些国家措施，许多人仍在‘使用中国电话’。”

朝鲜政权为了控制阿拉伯地区反叛消息的努力只是一场逐渐陷入绝境的外国媒体歼灭战中浮出的一角。在过去的十年里，个别像 NKIS 这样在首尔建立的团体已经利用南边逐渐扩大的朝鲜叛逃者网络开始渗入北边政权构筑的保密之墙。结果就是形成了一股日益高涨的穿越边界的双向信息流——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对朝鲜人生活的认识。其中走私者也占有一席之地，从中国将韩国的 DVD 和音乐引入了朝鲜。

“当权者最害怕的实际上是信息，”NKIS 的副主席赫英雅（HyunIn-ae）说道，她将包含娱乐和政治材料的 U 盘送入朝鲜。考虑到巧饰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朝鲜人接触到的任何韩国

媒体——不论是新闻还是肥皂剧 DVD——都只会加深这种矛盾。“我们确实掌握了证据，看到这些东西的人越多，他们就会越加质疑”朝鲜的体制，她说道。

一名于幼时 1999 年逃离朝鲜的 24 岁女孩郑有美（Jeong Yu-mi）说，韩国媒体的传播毫无疑问将侵蚀朝鲜政权对完美无瑕的“敬爱领袖”金正日的离谱断言，也会削弱韩国“傀儡政权”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这样的宣传。“通过途经中国的走私，今天能看到的韩国电视剧明天就能在朝鲜播放，”她说，“藉由这些视频，人们可以看到韩国人民的生活有滋有味。”

朝鲜的管制是迅速和严厉的。上个月流出了在中朝边境城市新义州（Sinuiju）的一座体育馆里举行的公审大会的视频。许多人因为持有韩国音乐而受审。根据位于首尔，专门传递朝鲜信息的《朝鲜日报》报道，该视频中可以听到一名法官说明被告因为“被指控录制、观看和聆听 1 部韩国电影和 75 首韩国歌曲”而被捕。

当阿拉伯之春变为阿拉伯之夏时，朝鲜或许认为自己已经躲开了危机，但是，封阻跨越边境流入的信息也许在今后会越来越难。彼得森学会的诺兰德表示，逐渐扩大的朝鲜黑市是对无能低效的共产主义体制的回应，将把外界的信息传入本国。

在最近几次与朝鲜难民的对话中，诺兰德已经发现了一种他称之为“市场综合症”的现象，显示出非法市场活动、接受外国新闻和表达对现政权异见的参与者之间的联系。他说，黑市具备成为“社会沟通中的半自治区域”的潜力，也是可能为政治组织提供空间。“简言之，”诺兰德说道，“信息和市场是息息相关的。”

金正日政权真的有可能被韩过流行音乐和肥皂剧掀翻吗？首尔国民大学（Seoul's Kookmin University）的朝鲜问题专家安德烈·兰科夫（Andrei Lankov）认为朝鲜政府面临艰难前景。他也同意黑市扩大了外国媒体在朝鲜的受众，未来将越来越难以加以控制。“99%是‘看不见的手’，”他说，“这与政治或个人无关，这是纯粹的生意。”

（译者：daiwq；原文来自译言网；原文链接：<http://select.yeeyan.org/view/136907/200414>）

[【返回目录】](#)



10-8 伊扎特：高压下的黑色幽默

“穆巴拉克和萨利赫们永远做着皇帝新装的美梦，用美好的宣传粉饰内心的罪恶。一个笑话不能引发一场革命，更不足以让一个政府下台，但是他起码能让百姓看清新装后真实的皇帝，终有一天独裁者们自己会意识到这其实只是一场黑色幽默……”



80年代初的北京，是我在中国的最初记忆。那时北京睡得很早，没有夜生活，我们留学生的经济有限，就一直在宿舍消磨着时间。

当时在中国的同学里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在夜晚的漆黑中看到有留学生宿舍亮着灯，要么是非洲学生喝酒听音乐，要么是东南亚学生在埋头看书，再有可能就是阿拉伯学生在谈论政事。

这句话确实不无道理，特别是对于阿拉伯学生的描述。一直以来，在政治高压下的阿拉伯各国，私下场合讨论政治如同家常便饭。但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些很容易给自己惹上杀身之祸，因此人们只能用笑话来表达对当政者的不满。

阿拉伯人通用的一种打招呼方式是“你听了最新的笑话吗？”这就如同中国人见面问候“吃饭了没”一样平常。政治以最自然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同家常便饭。

毫无疑问，笑话是民间文学的一部分。只有成熟的社会形态，才能以笑话克服他们所面临的困难。这些笑话的起源已经无从查证，传播轨迹也早已无人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笑话都是在强烈的政治高压下出现，反映社会矛盾，也表达出草根阶级对阿拉伯各国政权的态度。在某一个民族主义情感高涨的时期，这种笑话出现的数量就会减少。

有人认为，每一个政治笑话都是一场小革命，发泄着底层人民积蓄已久的怒火。弗洛伊德称之为抗议的重要工具，更有甚者，称其是可以多次爆炸的核武器。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在现时的阿拉伯民主实践中，一个个揭露当权者恶行的段子成为聚拢民心的工具，同时又不断有新的段子涌现，客观上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政治笑话由来已久，并让很多当权者重视。它就如同一个完整透明的街头民调，你无法修改它的结果，只能引以为戒。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戴高乐将军把街头流传的政治笑话作为老百姓评价自己政绩好坏的一个标准，一旦某条笑话或某份报纸刊登的政治漫画对其表达批评和讽刺，他会认为自己在老百姓心中的信任程度在下降。

同样，埃及前总统纳赛尔也经常关注在百姓中流传的政治笑话，他甚至要求手下每天到街上搜集关于他的笑话。在阿巴斯还没有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之前，他也曾不惜花费 500 美金换取自己不知道的笑话。

埃及革命爆发后，解放广场成为了一个政治笑话创作和传播的集散地，许多阿拉伯研究机构此时也开始重视并分析笑话所产生的影响和它所导致的结果。

一般来说，街上的咖啡馆往往是笑话的传播场所，人们三五成群地边喝咖啡边交流着各自听来的笑话和小道消息。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网络成为笑话的又一种传播途径，阿拉伯国家出现了专门收集政治笑话的网站。政治笑话无需画面来表现，因此比视频、漫画更容易传播，影响力也大大高于其他形式的政治讽刺作品。

当然，因为文化和语言习惯上的差异，阿拉伯的一些笑话很难让国外读者真正领会其中的意义。在埃及革命时期，解放广场上的抗议者充分发挥了他们非凡的智慧。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几个小孩子旨在赶走独裁者的标语，“穆巴拉克，你快走吧，爸爸一直在看半岛电视台，我们要看动画片！”，一个新婚的青年人的牌子上则写着“你快下台，我夫人想我！”。抗议持续数天后，解放广场的人们对穆巴拉克的无所作为而愤怒，有人在抗议的白纸上写上了“你快走吧，我胳膊都疼了！”。

这些行为对埃及革命的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有一种说法把埃及人看作是世界上最具有政治笑话天赋的一个群体。世界上最早有记载的笑话出自埃及：一次法老一时兴起，想去尼罗河钓鱼，到了那里却发现河里一条鱼也没有，法老指着一群百姓对身边的侍从说，“你把他们扔进去当鱼吧”。

在现在看来，把这当作一个笑话似乎很牵强，但在当时，民众就已经开始用这种轻松的方式表达对当权者的不满。1889年，一家专门供人进行笑话创作的咖啡馆在开罗开业，咖啡馆的名字就叫做“笑话馆”。当时的埃及尽管法律上仍归属于奥斯曼帝国，实已被英国占领。这个咖啡馆的开张立刻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一个个针砭时弊，反抗英国殖民者的笑话也从这里传播到阿拉伯各地。

在穆巴拉克时代，由于经济情况越来越糟糕，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底层民众对上层建筑的不满日益加深，政治笑话也随之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一天，穆巴拉克与他的政府官员正在召开一个夜间会议，他的夫人打电话给他，“哈比比（亲爱的），我在家里听到了一些怪怪的声音，恐怕是有小偷进来了。”穆巴拉克淡定地安抚妻子，“你放心吧，他们都在这儿开会呢。”

穆巴拉克访问一所小学，他问一个学生，你长大之后想当什么啊？学生回答，“总统阁下，我想要当一名部长。”穆巴拉克笑了，“孩子，你是笨蛋么？部长有什么好当的？！”学生不解地问，“总统阁下，这是当部长的必要条件么？”

一个在埃及旅游的美国不屑地对埃及导游说，“你们太没有民主了，在美国，我们可以很自由地在大街上骂美国总统。”埃及导游哈哈大笑，“你错了，我们这里最民主了，你没看我们的人民天天在街上骂美国总统。”

一些笑话讽刺了政府的低效和无能。开罗的路面上出现了一个大坑，引发多起交通事故，很多人因此被送往医院。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解决办法，卫生部长建议在坑的旁边建造一所医院，方便伤员治疗；交通部长建议多进口一些救护车以便及时运送伤员，双方因此争得面红耳赤，只得将问题报送穆巴拉克。穆氏怒斥两位部长：“白痴！现在经济这么困难，你们就不会把这个坑填平，到医院旁边再挖一个新的吗？”

一个埃及人捡到一盏阿拉丁神灯，他喜出望外地搓了三下，一阵浓烟之后从神灯里冒出来两个人，埃及人疑惑地问，“你们两位到底谁是精灵？”其中一个解释道，“我是精灵，另外这位是我政府部门的合作伙伴。”

在病床上，病入膏肓的穆巴拉克哀叹道：“要是我去了，埃及人民怎么办啊？”他的顾问试图安慰他：“总统先生，不要担心埃及人民，他们吃苦耐劳，即使吃石头也能活下去。”穆巴拉克不再哀叹，并陷入了思考，过了一会儿，他告诉顾问去把石头的独家经营权授予他的儿子阿拉。

穆巴拉克对权力的贪婪，也被反映在民间的政治笑话里。一天，穆巴拉克，奥巴马和普京正在开会，突然上帝出现在他们面前说：“两天之后就是世界末日了，快去通知你们的人民。”三位领导人各自回到各自国家的首都并准备发表电视讲话。在华盛顿，奥巴马说：“亲爱的美国人民，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告诉大家。好消息是我可以证实上帝是存在的，坏消息是上帝告诉我两天后世界就将毁灭。”在莫斯科，普京发表讲话说：“俄罗斯公民们，非常遗憾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两条坏消息。第一，上帝是存在的，这也就意味着上个世纪里大部分时间我们信仰的东西都是错的。第二，两天之后世界将毁灭。”在开罗穆巴拉克说：“我的埃及子民们，今天我有两条非常好的消息带给大家。第一，我刚和上帝举行了一场重要的会议；第二，他告诉我说我一直是你们的总统直到世界末日。”

在另一则笑话中，克林顿总统访问埃及的时候对总统穆巴拉克的支持率如此的高以及他不费吹灰之力赢得总统连任非常的惊讶。克林顿对穆巴拉克说：“我马上也要进行连任选举，你能派你的选举顾问去华盛顿在大选中助我一臂之力吗？”穆巴拉克欣然同意并把他的选举团队派往美国帮助克林顿。在选举日所有的计票工作结束后发现，穆巴拉克获得了 90% 的选票。

出租司机艾哈迈德在汽车里挂了三位埃及总统的照片。一个外国人问他，这些人是你的家属吗？艾哈迈德说不，第一个是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纳赛尔，第二个是亲爱的给我们带来和平的总统萨达特。外国人指着略显肥胖的第三个人问，“那这个呢？”“哦，这是我合作伙伴的父亲”。

埃及官场的腐败也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官员们只顾及满足个人的私欲而对人民疾苦置之不理。

一个渔夫在尼罗河里钓到一条大鱼，他高兴地抱回家给妻子。“我们炸着吃吧！”妻子说，“油很贵，我们已经快买不起了”，渔夫很内疚，“那就蒸一下吧”，妻子遗憾地说，“没有天然气。”渔夫皱了皱眉，“那就煮着吃吧”，“停电了”……过了一会儿，渔夫耸了耸肩，走出门去，“没办法，只能把它放回尼罗河了”。渔夫一松手，这条鱼飞快地跃入水中，同时扭动着臀鳍高喊“穆巴拉克万岁！”

有一个贫穷的埃及人即将迎娶心爱的未婚妻，新娘的父亲向他索要巨额的彩礼。他向身边的朋友求助，朋友问他，“新娘的父亲什么职业？”“警察”，朋友会心一笑，“好办，把他叫住给一百块钱私了就行了！”

在解放广场上，两个埃及青年憧憬着未来。“如果我们胜利了，下一步怎么办？”“那还不简单，肯定是跟突尼斯打决赛了”。

在革命之后，新的段子很快诞生并在阿拉伯世界流传。下台后的穆巴拉克想尽一切办法逃跑，为了躲避追赶的人群，他爬上了一棵树。过了一会儿，也门总统萨利赫也来了，他看到树上的穆巴拉克，说你下来吧，我给你一千万美金，穆巴拉克不听。又过了一会儿，卡扎菲拿着一把电锯大摇大摆地走来，吼道，下来，不然我把树锯了！穆巴拉克于是乖乖地爬下来，萨利赫抱怨说，你胆儿真小，我给你一千万你不理我，卡扎菲一说锯树你就下来了。穆巴拉克说，你是个说话不算数的骗子，可卡扎菲他是个疯子，什么都干的出来！

萨利赫经常强调，他可以下台，但前提是先与反对派在谈判桌前进行对话。他的私人医生建议他摆脱持续多年的烟瘾，他说，“可以，让我们先坐在桌子前面对个话吧。”

在也门革命中，很多军队和政府的官员纷纷倒戈，加入了反对派阵营。一天，萨利赫的儿子，也是萨利赫指认的总统接班人艾哈迈德跑进总统办公室，一只手举起胜利的手势。萨利赫问儿子，“我们胜利了吗？”艾哈迈德回答说，“哦不，这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穆巴拉克和萨利赫们永远做着皇帝新装的美梦，用美好的宣传粉饰内心的罪恶。一个笑话不能引发一场革命，更不足以让一个政府下台，但是他起码能让百姓看清新装后真实的皇帝，终有一天独裁者们自己会意识到这其实只是一场黑色幽默。

（伊扎特：阿拉伯公民，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原文链接：
<http://yizhate.blshe.com/post/534/686052>）

[【返回目录】](#)

【因】

10-9 熊培云：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评《浪潮》

“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也都有灌溉独裁的潜力。只要条件成熟，这一切难免会与一种恶的集体主义里应外合，长出独裁的恶之花。”



今日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也正在试图从“后极权”的坑坑洼洼中走出。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当历史翻过黑暗的一页，过去那个血腥而愚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么？

世界离独裁有多远？35岁的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Dennis Gansel)透过他杰出的电影《浪潮》(Die Welle)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1. 纳粹速成班

汽车摇摇摆摆，车外人来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轻松而热烈的摇滚音乐中开场。这是一所普通的德国中学，主人公赖纳·文格尔(Rainer Wenger)是该校一位老师。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老师抢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无回旋余地，文格尔只能硬着头皮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主讲他并不喜欢的“独裁统治”。

故事就这样围绕着接下来的一周展开：

星期一。文格尔来到教室时，教室里一片自由散漫的气氛。显然，文格尔并不适应这个课堂以及他将要讲的课。“如果我是你们会去上无政府主义的课，而不是听这倒霉的独裁统治。”这是他的开场白。当他将“Autokratie”（独裁统治）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仍在看闲书、发短信，东倒西歪，以至于文格尔不得不停下来希望大家“给点反应”、“好歹这一周要打发过去。”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经心地讨论独裁统治时，文格尔陷入了深思。显然，他并不相信学生们所说的“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或“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课间休息后，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准备做一个试验，让学生们体会独裁的魅力。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就是“纪律性”。通过口头投票，最后文格尔成为课堂上的“元首”。接下来他要纠正大家的坐姿，而且发言时必须站立，必须尊称他“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时正襟而坐的学生们向他齐呼“早安，文格尔先生”。“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这节课，文格尔要求大家站起来像军人一样踏步，“感觉所有人都融为一体，这就是集体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个目的是，一起将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踩在脚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上的灰”。显然，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试图给“独裁班”的学生们一种优越感——“无论表现怎样，我们这个班也比楼下的‘无政府主义班’要好”。接下来，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一种廉价的白上衣与牛仔裤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课堂上，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她的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上学路上，她的男友在说她“自私”，而现在文格尔几乎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也不和她讨论，并视之为异类与不合作者。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个名字，最后“浪潮”从“恐怖小组”、“梦想家俱乐部”、“海啸”、“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红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变革者”无人响应。这节课还定下了“浪潮”的标志。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浪潮标志。

星期四。在“浪潮”组织中获得归属感的成员们的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课上有人动议，既然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手势，浪潮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这是一个右手在胸前划波浪的手势。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浪潮”，并以是否做这个手势与他人划分界线。甚至



连卡罗年轻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进来，甘愿为"浪潮"把门，凡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都不许进学校。卡罗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她奉劝文格尔立即中止这个游戏，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星期五。课程接近尾声，文格尔希望大家将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文格尔激进的教学方式同时受到来自校方与家庭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情绪失控而掌掴女友卡罗的马尔科后悔不已，乞求文格尔能中止这一切，并指责这所谓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的一套。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如期漂亮的结尾。当晚，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文格尔发来的一条短信:事关"浪潮"的将来，周六 12 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

星期六。学校礼堂。文格尔让学生关闭了礼堂。在选读了几篇学生们关于"浪潮"的体会后，文格尔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并煽动学生们将其间提出异议的马尔科揪上台来。在一片"叛徒！叛徒！"的高呼声中，马尔科被争先恐后的学生们举到了台上，以接受惩罚。事情本来到此为止，接下来文格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并宣布独裁实验结束，"浪潮"从此解散！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着文格尔的意愿发展下去。狂热分子蒂姆拔出了从网上购得的手枪，乞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背叛，即使文格尔也不成。电影由此进入高潮，蒂姆枪杀了一位同学并在绝望中吞枪自尽，重重地倒了下去。

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纳粹速成班"的故事。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顺理成章。

2. 蒂姆是一个隐喻

《浪潮》是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那是在 1967 年 4 月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位学生向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



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对此，琼斯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后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而且，不出琼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实验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五天以后，当几百名学生在礼堂里伸出手臂向琼斯致以崇高的“浪潮”问候礼时，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许正是里芬斯塔在《意志的胜利》（1934）中记录的德国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不过一切还好，琼斯最后控制了局势，戛然而止——“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在最后的聚会上，琼斯接下来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琼斯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

相较琼斯的实验教学来说，《浪潮》的结局显然更富戏剧性，残酷的陡转让你不得不认为导演甘赛尔从《死亡诗社》的结尾中获得灵感。尽管这种剧烈的冲突招致一些批评。但在我看来，狂热者蒂姆（Tim）的出场，恰恰是《浪潮》区别乃至超越琼斯教学实验之关键所在。我甚至认为，从影片所要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浪潮》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文格尔，不如说是蒂姆。

蒂姆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学校更是经常被人欺负，被人称作“软脚虾”。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围能有几个“兄弟”。为此，他经常给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并在后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讨好说：“是送你们的，我们是兄弟。”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把他这个窝囊鬼当兄弟。

对于为什么加入“浪潮”，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理由。显然，对于蒂姆来说，“浪潮”更意味着一种梦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后来握在手里的手枪一样。文格尔的介入与“浪潮”的成立，显然给一直处于“校园底层”的蒂姆的生活带来转机。而且，他竟是那样全心全意，甘于冒险犯难。为了制服，他焚毁了家里所有名牌上衣。制服的确给蒂姆带来一种神奇的力量感。当他被欺负时，他开始试着反抗，而与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员也走过来保护了他。因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觉自己不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龙的一部分。在喷涂“浪潮”标记时，他不顾危险爬上市政府大楼。他不仅用假手枪吓退了寻衅斗殴者，甚至自告奋勇要为“元首”文格尔的保镖，



弄得文格尔莫明其妙。蒂姆诚心诚意地想维护"浪潮"的坚固，要光大它的荣耀。在他看来"浪潮"就是他梦想中的帝国，而文格尔先生就是能为他引领未来的领袖。

了解了蒂姆的这种近于迷狂的心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后会拔枪。从中也不难发现，在类似"浪潮"的组织中，加入组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绑架的过程。它提倡以组织的名义消灭异类，却不允许成员主动退出，因为主动退出对于组织而言是一种不可控的行为。文格尔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当他像赵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应允，而不能主动退出。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一个人信仰乌托邦并非恶，真正的恶是这种乌托邦被赋予魔力，从而具有进攻性。显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个隐喻，被革命唤醒的怪兽，被科学家创造的弗兰克斯坦，抑或其他。"浪潮"使蒂姆获得了"新生"，他的成长远远超出了文格尔所能控制的范围。组织之我的成长，同时意味着个体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纳粹速成班"不仅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微缩的纳粹德国，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学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个体被集体化如何被异化。

在第一节课上，当被问及"独裁统治的基础是什么？"学生们回答包括意识形态、控制、监视、一位元首等等。同样，高失业率与社会不公、通货膨胀、政治信用破产、民族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独裁的诞生。不过，这都是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当这一切变成一种日常的和风细雨时，"浪潮"成员们似乎都失去了警觉，而是沉醉于他们的同志友爱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有关独裁的典型元素：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与言论自由的取消，一个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

类似黑话的手势，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利他名义下的强迫，对未来利益的许诺，标榜团结的仪式，归属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仅是一个平等的集体，也是一个健康的集体，站起来回答问题首先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星期六的会场上，当文格尔指责马尔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时，旁边一位女生称马尔科“已经被传染了”。在他们看来，谁反对浪潮谁就是瘟疫。只有拥护“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为了维持这种健康，文格尔在演讲中指责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输家，政治家根本是经济的傀儡。“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此时此地，我们要创造历史。从现在开始，浪潮将席卷全国，谁阻止它，浪潮就将它吞噬。”也正是这个原因，觉醒者马尔科被当作敌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关于为什么加入并沉醉于“浪潮”，文格尔选读了学生们的部分感想：“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从前我总是惹事生非，‘浪潮’让我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足够了。”“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愿为此重新做人。”

然而，这种平等，正如托克维尔在 1848 年的一篇演讲中所提到的：“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显而易见，浪潮寻求平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通向奴役之路的过程。

正如文格尔最后打开谜底时所说的：“你们还记得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吗，独裁统治是否会实现，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义。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队在这个集体之外，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浪潮”本是个中性词，当它成为一种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恶。

4. 人性没有终结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时，一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著名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阿伦特发现了一种基于日常服从的恶。也就是说，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为此，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 1974 年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请一批实验志愿者在一群实验组织者——心理学家们的监督下，考察一群被实验对象的单词记忆能力。每个实验对象的身体被联接到一根电击棒上，电击棒由志愿者们操控，被实验对象每次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要对他进行电击一次，电压强度逐次提高 15 伏，最高达到 300 伏。实验过程中，很多被实验对象在高压电流的刺激下，反复挣扎，发出惨叫，请求停止试验，当时情形如同梦魇，按照一般人的逻辑，目睹被实验对象的种种挣扎，很多志愿者一定会停止电击，放弃实验。然而事实是，所有志愿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来，其余全部完成了实验，也就是说，对被实验对象都实施了电击，最高达到 450 伏。也就是权威在场时，人们会服从权威，即使作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不安。

当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夺池、遍地开花时，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谁也不能打保票说，人类可以坐享民主之成，从此一劳永逸，因为"人性没有终结"，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屡屡读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

比如 2008 年 4 月 13 日晚，昆明某高校发生一起内衣丢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桩恶劣的校园暴力案件。10 个女生围住另一位不停殴打，有人向她头上浇淋吃剩的方便面汤，有人在她脸上用眉笔写字。更为恶劣的是，甚至当着男生的面，这些人强迫这位女生脱下裤子暴露下身，并用手机拍下施暴与受辱的照片和视频……



谁能想象，这些恶正是被视为善与美的象征的女人干的。我曾经说，没有底线地合群，人类会走向疯癫。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也都有灌溉独裁的潜力。只要条件成熟，这一切难免会与一种恶的集体主义里应外合，长出独裁的恶之花。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让我们回到 1967 年 4 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就在试验结束之时，罗恩·琼斯对他的学生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熊培云：《南风窗》驻欧洲记者，专栏作家。原文链接：http://book.ifeng.com/special/yijiubasi60/list/200907/0706_7195_1236489_3.shtml）

[【返回目录】](#)

10-10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节选：伟大的乌托邦

“毫无疑问，对更大自由的允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宣传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而且，对社会主义将会带来自由的信念是真心实意的。但是，倘若允诺给我们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旦事实上被证明是一条通往奴役的大路的话，悲剧岂不更惨。”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F·荷尔德林

社会主义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这不只意味着，人们已经忘记了以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有关集体主义后果的警告。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相信与这些思想家所作的预言正好相反的东西。令人惊讶的是，同一个社会主义，不仅在早先被公认为是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而且从一开始便十分公开地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却在自由的旗帜下获得普遍的认可。现在难能有人还记得，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性质。奠定现代社会主义基础的法国作家们毫不怀疑，他们的种种思想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独裁政府才能付诸实行。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它只不过是通过对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终结革命”的一种尝试。论及自由之处，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意图。自由思想，在他们看来是 19 世纪社会的罪恶之源，而现代计划者中第一人圣西门甚至预告，对那些不服从他所拟议的计划委员会的人，要“像牲畜一样来对待”。

只是在 1848 年革命前强大的民主潮流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才开始与自由力量联系起来。但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用了很长时间，才改变了做法并消除了其先例所引起的疑虑。没有人比德 a 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在 1848 年说：)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1848 年 9 月 12 日在制宪会议上关于劳动法问题的演讲"，见《亚里克西·德·托克维尔全集》，第 9 卷(1866 年)，第 546 页。

为了减少这些疑虑，并将一切政治动因中最强烈的动因--渴求自由为己所用，社会主义开始日益利用一种"新自由"的允诺。社会主义的来临将是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它将带来"经济自由"，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值得拥有"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完成长期的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政治自由的取得仅仅是第一步。

将自由一词的意义稍加改变，使这个论点听来似乎应当合情合理，这种意义上的微妙变化是重要的。对政治自由的伟大倡导者们来说，这个词意味的是免于强制的自由，是摆脱了他人专断权力的自由，是从种种束缚中的解放，这些束缚使个人除了对他们隶属的长官唯命是从之外别无选择。然而，所允诺的新自由却是摆脱了必然性的自由，是从环境的强制中的解放，这些环境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我们所有人的选择余地，尽管对有些人来说选择余地比对别的人更大些。在人们能真正获得自由之前，必须打破"物质匮乏的专制"，解除"经济制度的束缚"。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不过是权力对自由和权力的典型混淆，我们在这一讨论的整个过程中将会一再地遇到，但这一题目太大了，此处不能彻底考察。它和社会主义本身一样悠久，与之密切相关，以至约 70 年前，一位法国学者在讨论它在圣西门学说中的起源时，不得不说这一理论"本身彻头彻尾地是社会主义的" (P·雅内：《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1878 年)，第 26 页，注释)。饶有意味的是，这种混淆的最明确的辩护者竟是美国左翼学说的主要哲学家约翰·杜威，据他说，"自由是用来做具体事项的有效权力"，因而"要求自由即要求权力"("自由与社会控制"，见《社会边缘》，1935 年 11 月，第 41 页)。或财富的代名词。然而，虽则这种新自由的允诺常常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大大增加的不负责任的允诺相提并论，但并



非出于这种对自然的吝啬的绝对征服，经济自由便指日可待。这个允诺实际上指的是，不同的人在选择余地上现存的巨大悬殊将被消除。因此，对这种新自由的要求，不过是对平均分配财富旧要求的代名词而已。但这个新名词却给了社会主义者一个与自由主义者共有的代名词，他们对其充分地加以利用。而且虽然这个词为两个集团在不同意义上加以利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更少有人自问，所允诺的这两种自由能否真正地结合在一起。

毫无疑问，对更大自由的允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宣传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而且，对社会主义将会带来自由的信念是真心实意的。但是，倘若允诺给我们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旦事实上被证明是一条通往奴役的大路的话，悲剧岂不更惨。毋庸置疑，对更多自由的允诺使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受到引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他们受到蒙蔽不能看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原则之间存在着冲突，并常常使社会主义者得以僭用旧有的自由党派的名字。社会主义被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奉为自由主义传统的当然继承者：因而，他们不能接受社会主义会导致自由的对立面的看法，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近些年来，对社会主义无法预料后果的旧有恐惧，再一次从意料不到的方方面面暴露出来。一个又一个的观察家，尽管在研究他们的题目时期迥异，但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下许多方面情况的相似性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这个国家和其它地方的"进步人士们"仍在自欺欺人，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代表着对立的两个极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问，这些新的暴政难道不是同一种趋势的后果。即使共产主义者们也想必多少已为诸如列宁的老友马克斯·伊斯门先生所作的那类宣言所震撼；他自己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并且它"最好被称为超法西斯主义"；当我们发现同一作者承认"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国有化和集体化不可预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政治附属物，而这两者都是他赖以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马克斯·伊斯门：《斯大林的俄国与社会主义的危机》(1940年)，第 82 页。他的结论明显地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伊斯门先生的例子或许是最显著的，然而他绝不是第一个或唯一一个对俄国的实验表示同情却作出类似结论的观察家。早在几年前，在俄国住了 12 年的美国记者 W·H·张伯伦先生眼见他的全部理想破灭，便将他在那里和德国、意大利所做的研究总结成这种说法："社会主义者

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实现并维持的社会主义，看来确实属于乌托邦世界。"W·H·张伯伦：《伪乌托邦》(1937年)，第 202-203 页。同样，一位英国作者 F·A·沃伊特先生，以对外记者的身份对欧洲的发展进行了多年详密的观察，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已经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因为就其全部本质而言，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F·A·沃伊特：《归于恺撒》(1939年)，第 95 页。而沃尔特·李普曼博士也已获得这种信念：我们所属的这一代人现在正从经验中懂得，当人们放弃自由，转而强制性地将其事务加以组织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尽管他们期望一种更富裕的生活，但他们在实践中肯定放弃了这种期望；随着有组织管理的增加，目标的多样化必定会让位于一体化。这是对有计划的社会和人类事务中独裁主义原则的报应。《大西洋月刊》，1936年 11 月，第 552 页。

人们从近年来的出版物中，可以挑选出许多有能力做出判断的人所作出的其它类似叙述，特别是由那种人所作的叙述，他们作为现在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亲历了这种转变，他们的经验迫使他们许多珍爱的信念加以修正。我们将再引用一位德国作者的话作为例子，他所发表的相同结论比我们已引用的那些更加公正：(彼得·德鲁克先生写道：)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溃，已经迫使俄国走上德国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这等于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被证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而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共产主义已经同样被证实是一种幻想。《经济人的末日》(1939年)，第 230 页。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纳粹领袖和法西斯领袖的精神史。每一位注意到这些运动在意大利对众多法西斯领袖精神历史的富于启发性的说明，参见 R·米歇尔斯(他本人是曾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法西斯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慕尼黑，1925年)，第 2 卷，第 264-266 页和第 311-312 页。或德国发展的人，都曾对许多领袖人物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从墨索里尼向下数起(并不排除赖伐尔和吉斯林)，开始时都是社会主义者，最终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分子。这个运动的领袖们是这样，下层的徒众们就更是如此了。在德国，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能比较容易地转变为纳粹分子，或者情形正相反，这是尽人皆知的，两党的宣传家们尤其了解这一

点。20 世纪 30 年代，这个国家的许多大学教师看到从欧洲大陆回来的英国和美国的学生，无法确定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纳粹分子，只能确定他们都仇视西方的自由主义文明。

当然，在 1933 年以前的德国和 1922 年以前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与纳粹分子或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的确比他们和其它党派之间的冲突更为频繁。他们竞相寻求同一类型思想的支持，而彼此保持对异端的仇视。但他们的实践表明他们的关联是多么密切。对两方面而言，真正的敌人是旧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与这些人毫无共同之处，也不能指望使他们信服。共产主义者之于纳粹分子，纳粹分子之于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之于这二者，都是潜在的招募对象，他们都由合适的材料构成；虽则他们听信了虚伪的预言家，但他们双方都知道，他们和那些真正确信个人自由的人之间毫无妥协可言。

为了使这一点不至遭到受来自任何一方官方宣传误导的人的怀疑，让我再来引用一位不应受到怀疑的权威人士的叙述。在一篇冠以“自由主义的再发现”这一有意义的标题的文章中，德国宗教社会主义的领袖之一爱德华·海曼写道：希特勒主义者称自己既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可怕的真相是，在诸如此类的声称中有一些微不足道的真实--当然，这是小得不能再小了，但无论如何足以构成这种荒谬歪曲的基础。

希特勒主义甚至于还声称扮演了基督教保护者的角色，而可怕的真相是，即使这种严重的歪曲也能给人留下一些印象。但有一个事实却十分清晰地从弥天大雾中凸现出来：希特勒从来不曾声称代表真正的自由主义。可见，自由主义具有成为最为希特勒所痛恨的学说的特点。

《社会研究》(纽约)1941 年 11 月，第 8 卷，第 4 期。在这方面值得回想的是，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希特勒在迟至 1941 年 2 月的一次公开演说中，还认为这种说法是策略的：“民族社会主义和徭克思主义根本来说是相同的东西”(参见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出版的《国际新闻公报》，第 18 卷，第 5 期，第 269 页)。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仇恨之所以几乎没有机会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仅仅是因为希特勒上台之时，自由主义在德国实际上已无声无息。而消灭它的正是社会主义。

对许多就近观察过从社会主义向法西斯主义转变的人来说，这两种制度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明显了，而在这个国家中，大多数人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和自由可以结合。毫无疑问，这里的

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深信不疑，如果他们认识到他们纲领的实现将意味着自由毁灭的话，他们是会回头的。这个问题仍然几乎未被看出，最不可调和的各种理想仍然相安无事，以致我们仍然能听到诸如"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类词语矛盾的说法还在一本正经地讨论着。如果这是使我们趋向一个新世界的精神状况的话，那么当务之急莫过于我们应当认真地考察一下其它地方所发生的这种演变的真实意义。尽管我们的结论只不过证实了别人已经表达过的恐惧，但如果我们不对这种社会生活转变的主要方面加以相当充分的考察的话，就不会看出不能将这种发展视为偶然的原因了。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几代人的伟大乌托邦，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为之奋斗还会产生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至现在对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准备接受这种结果；除非这种关联全方位地展开，否则是没有人会相信它的。

（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原文链接：<http://book.douban.com/reading/10118272/>）

[【返回目录】](#)

【FMN 一周新闻综述】

1、陈光诚

10月23日有将近30名网友探望陈光诚，但当日上午他们一行人刚刚走到东师古村村口就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围殴并抢劫，且有人伤势严重，FMN对网友被打的情况做了一个汇总，供大家参考。

新闻：<http://fmn.cc/po5pt0>

10月24日成都商报记者李建军到达临沂且先到当地市委提交一份《谏临沂当局书》，要求对23日多位网友被打一事作出解释，并公布了该名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FMN致电这名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替领导表示探访陈光诚的公民不会被打。李建军定于24日达到东师古村，是否会遭遇暴力仍待观望。

新闻：<http://fmn.cc/po5pt0>

成都商报记者李建军自10月24日起便赴临沂探望陈光诚，他也走访了临沂市委、沂南县委、县公安局、双墩镇派出所等地，虽然得到的答复都是探望陈光诚是公民权利，但在沂南界内遭遇跟踪、同行女士被警员打了一巴掌，让他觉得到东师古村见陈光诚十分困难且无安全保障。

新闻：<http://cn.fmnnow.com/?p=728>

针对众多网友被东师古村的看守洗劫且报警后无人回应一事，网友屠夫致电临沂公安局，接电话的女警听到同陈光诚有关后，对他说：“跟祖国作对的话，你也没什么好下场”。录音可见新闻中。

新闻：<http://cn.fmnnow.com/?p=725>

2、独立参选人

北京、上海的独立参选人在上个周末也遭遇了很多困难。比如有选举办负责人误发短信给参选人称将他排除；外国媒体记者采访北京参选人时遭遇便衣“围观”；多所大学的教授或学生参选遇困难等等。FMN特为他们做了一个新闻汇总。

新闻：<http://fmn.cc/o2KI03>



北京 13 名联名参选人之一的吴丽红自 9 月 29 日因她起诉案件开庭到朝阳区法院后便失踪，24 日下午她终于回到家中，表示她在庭审结束后被法警用电棍电晕昏迷了 2 日才醒来，还遭遇拘禁。

新闻：<http://cn.fmnnow.com/?p=734>

杭州市下城区参选人宣布因个人原因退选，北京朝阳区的柳红，海淀区的韩颖、熊伟、刘超，昌平区的李昆鹏等均成为了他们所在选区的初步候选人，但已得出结果的人无一例外的被排除在正式候选人名单之外。

新闻：<http://cn.fmnnow.com/?p=732>

3、中国外交部

由于有长城防火墙的屏蔽，例如 Facebook、Twitter、Google 等外国网站在中国无法正常使用，10 月 20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回答有关“防火墙”问题时称，“不接受任何以互联网自由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

新闻：<http://fmn.cc/qWZUn3>

外交部网站 10 月 21 日发布了非洲司司长卢沙野接受法国《青年非洲》记者采访的文章，涉及到中国对非洲政策等问题，当被问及有关“不干涉内政是否会造成消极后果”的问题时，司长称“卡扎菲不是中国的好朋友”。

新闻：<http://fmn.cc/rbPkGy>

北京时间 10 月 20 日晚间传来消息，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死亡，10 月 21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 2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利比亚的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还称“中国在利比亚问题上没有私利”，疑在回应当初武器出售问题。

新闻：<http://fmn.cc/qEsXuf>

10 月 19 日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会见丹麦大臣时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发表看法，他说：“当前全体中国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任何偏见都应予以纠正”。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新闻：<http://fmn.cc/p1GgL7>



4、其他重点新闻

10月24日全国人大审议的《居民身份证法》（草案）称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至少拘留十日，还有专家认为指纹隐私性弱，建议加血型信息。另一方面草案中还增加警察查验身份证情形，即“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引发了不少人对权力滥用的担忧。

新闻：<http://fmn.cc/v30aGv>
<http://fmn.cc/rrhPRN>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证实佛山被汽车碾压的2岁女童悦悦于2011年10月21日零点三十二分终因抢救无效宣布死亡，据媒体介绍，她离世时父母陪在身边。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谈到“小悦悦事件”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

新闻：<http://fmn.cc/r8wU61>
<http://fmn.cc/nR9XTq>

广电总局“限娱令”在近日正式下发，要求各省级卫视频道在晚上7:30-10:00的黄金时间，每周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此外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选秀节目数量也将严格受限。

新闻：<http://fmn.cc/uLE8r7>
<http://fmn.cc/vUoP1C>

中国政府提出多时的发展文化口号最终在10月2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落实为条文，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发展文化产业等9个部分。

新闻：<http://fmn.cc/uw1tay>

10月24日国家保密局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此前中国经济数据遭泄露一事时表示，泄露内地未公布经济数据须负法律后果。会上同时公布了2名中央干部因泄露经济数据分获5年、6年徒刑的案例，据称他们一人是原统计局干部，另一人则是央行干部。

新闻：<http://fmn.cc/nLeNRe>

河北深州监狱一名犯人在 9 月 11 日越狱引起关注，狱中工作人员反映，监狱为节省电费，有时会拉闸限电，犯人在狱中会使用手机，且很难查处。刚出狱的狱友则透露，有“倒爷”会向犯人倒卖手机卡、现金、宠物等各种违禁品。监狱管理混乱问题呈现在公众面前。

新闻：<http://fmn.cc/sUkbS5>

一个县城的情境可能反映出了中国官场的形态，北大一博士在一县城挂职两年完成博士论文，调查显示 80 万人口的县城却有上万官员，并且有多达 21 个政治“大家族”，他的这篇文章引发了外界关注。

新闻：<http://fmn.cc/si1caU>

日前有储户称他们存在大连一银行的 4500 万元存款消失，知情人称可能被用于放高利贷，且因资金链断裂无法按期回行。同时民间借贷的风暴已袭向河南，据调查河南省内有 112 家担保机构存在较大风险，当地政府已采取了一些措施。

新闻：<http://fmn.cc/tEDmdr>

<http://fmn.cc/tRqSHI>

[【返回目录】](#)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二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 <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subscribe@googlegroups.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 <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 [Co-China 論壇 \(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 [CoChina 論壇 \(http://t.sina.com.cn/1729620664\)](http://t.sina.com.cn/1729620664)

编辑: [丁昕 胡俊熹](#)

校订: [姚梧雨童](#)

主编: [方可成](#)

版面设计: [豆芽](#)

配图: [王琳](#)

技术支持: [毛向辉 舒欣](#)

出品人: [杜婷](#)

版权声明: 1510 电子周刊所选文章版权均归原作者所有,所有使用都请与原作者联系。

